

書叢際國

余楠秋 吳道存 譯述

11.8  
17  
世界三大獨裁

敬

1816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中華書局  
新編定本  
1.405

丙6

---

余楠秋  
吳道存  
譯述

國際叢書  
世界三大獨

中華書局印行

---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者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

各埠

國際書界三大獨裁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角

(郵運匯費另加)

John Gunther

余楠 吳道 存秋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上海 澳門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中華書局發行所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翟伊文)

(一一〇六七)

## 譯序

威爾遜總統說，美國之參加大戰，是爲『民主政治的安全』。固然歐戰告終，德國的霍亨索倫王朝，奧國的哈布斯堡王朝，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以及土耳其的奧士曼理王朝都崩潰了；但是民主政治並不『安全』。相反地，時至今日，已是獨裁政治的時代。獨裁政治何以在戰後能夠成功呢？這在本書的裏面可以找到答案，這裏用不着述及了。

『世界三大獨裁』是譯自美國的 *Harpers* 雜誌。慕索里尼譯自一九三六年二月號，希特勒譯自同年一月號，斯達林譯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著者爲 John Gunther 一人，所以三篇文章是一氣呵成，許多地方是互相對照的。三大獨裁的身世，性格，私生活，和政治主張，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概念。這便是譯述的動機。

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在他的『斯達林傳』裏談到『兩個世界』，一個是『白色恐怖』 (White Terror) 的世界，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世界。『世界三大獨裁』之

二是代表前者，而另一獨裁是代表後者。世界到底向那裏去？讓時間來回答吧。

譯者一九三六年五月

# 世界三大獨裁目次

## 譯序

第一章	慕索里尼	一
第二章	希特勒	三八
第三章	斯達林	七二

世界三大獨裁

二



# 世界三大獨裁

## 第一章 慕索里尼

比涅托·慕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是一猛烈而文雅的人物，鐵匠的兒子，近意大利的手創者，阿比西尼亞戰爭的製造者，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羅馬格納 (Romagna) 的一個村鎮多維阿 (Dovia di Predappio)。他的事業是集近代史上變節者，暴徒及天才的大成。

除了窮困以外，他的顯然的動機是找不到的。他的父親固然為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是本鄉地方的無政府主義黨人；但是慕索里尼的生命中沒遇到如列寧、親兄或皮爾蘇德斯基 (Pilsudski) 親兄被處死刑的悲劇。他的母親是一個教員，如一切偉大人物的母親

一樣，她爲一個非凡的婦人，但似乎她給予慕索里尼的影響是微小的；慕索里尼雖然敬愛他的母親，而不如希特勒一樣，只知道對母親表示幼稚的親愛。凱末耳（Kenal Atatürk）的母親受希臘人的酷刑，於是後來這位土耳其的獨裁者在海上擊敗希臘人；在慕索里尼的生命中是沒有那種劇情式的和直接的衝動，使他要彌補憾事。

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容易地發現慕索里尼有什麼特殊的個人的偶然事件，使他成爲偉大，好像這位意大利的法西黨領袖，如果沒有那偶然事件，要一生一世做一個鐵匠的兒子，老死於福爾利（Folli）。羅素曾指出，假使沒有一個德國將軍讓列寧乘一輛被掩蓋着的火車經過德國，俄國革命也許不會發生，這是可能的。如果托拉斯基（Trotsky）不因一時之憤而拒絕參加列寧的葬禮，俄國決不會有五年計畫，這更是可能的。奧國陶爾斐斯（Dollfus）獨裁之所以成爲可能，因爲一個社會主義的議員在決定投票時走到浴室裏去。那種個人的偶然事件，在歷史上是佔重要地位的，而在慕索里尼的生命中並不顯著。他造成他自己的幸運。他的事業是一個不斷的繁茂的生長，如同某種惡草的生長一樣。

慕索里尼少年時代所受的主要的個人影響，大概是瑞士的一個俄國流犯，巴拉拜諾夫人（Madame Angelica Balabanov）在他的初期革命時代，她當心着他，改善他的健康，給予他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糧食。慕索里尼是個瓦匠，他之與列寧相遇，顯然是由於巴拉拜諾夫的介紹。若干年後，列寧責備意大利社會主義黨人『失去』慕索里尼，稱他是他們中最好的人。

每個人是一個各種志願的決鬪場，各種志願的池沼。慕索里尼初年的志願，大部份是文學的和智識的。嗜好學問而天資聰敏的他，讀過馬克斯，黑格爾（Hegel），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巴利多（Pareto），索勒爾（Sorel）。他像吸墨水紙一樣地吸收了他們的思想。從尼采他學到恨羣衆，而從馬克斯他學到愛他們。他記下在他的少年時代，他總是將他的馬克斯獎牌放在衣袋裏。

阿萊山多·慕索里尼（Alessandro Mussolini）（註）和羅梭·馬爾托涅（Rosa Maltoni）她爲一個鄉村學校的教師）的兒子，是在極貧困的環境中成長的。一直到二十

歲，還沒有嚐過咖啡的滋味。他沒有墊子睡，而是睡在一捆草上，他生下來的中間房子現已改作爲一個博物院了，而保存着那十分貧窮的象徵。慕索里尼常回到他的家鄉去；在家鄉附近建設了一個模範農場。不如希特勒一樣，他是注意他的幾個仍然活着的親戚的生活的。

【註】他以墨西哥革命者比涅托（Benito Juarez）名他的兒子，比涅托是發令將墨西哥米倫皇帝（Emperor Maximilian）處死的。

雖然他的父親是一個鐵匠，而他的家庭，數代以來都是耕田。一九三五年十月，他對農民說：「歡喜在舊紙堆中搜集考據的人以爲他們發現了我的祖先是貴族，定可以使我高興，而我對他們說，「不必再說這種話。」我的祖先都是農人，爲免除一切懷疑起見，我在那老農場的牆上刻了一個碑，寫着我以前的各代慕索里尼都是用手耕地的。」

慕索里尼因他的母親的主張，入了一個教會學校（如斯達林和凱末耳一樣），雖然他父親是反教士的。後來他自己教書，每月賺五十六里拉（那時等於十一元二角金元）

一直到逃往瑞士爲止——注意他之逃亡是求避免軍役。這時他是十九歲。他在一家巧格力廠做泥水匠兼工人以糊口；他常常地受着饑餓，巴拉拜諾夫曾描寫他有一次如何搶奪在一個公園裏野宴的兩個英國女子的食物。在夜間他便研究社會主義。他變成煽動者了，於是與警察發生糾紛，被監禁起來，從瑞士這一個縣被逐至那一個縣。慕索里尼在意大利和在瑞士合起來共被捕了十一次之多。

他怨恨牢獄；他看不起牢獄中的不道德的污辱的事，及不高興被禁中的身體的不舒適。有一次他被日內瓦警察命打手印；自那時以後他便厭恨瑞士了，如果我們認爲他的不歡喜國聯，一部份的原因是由於他少年時曾受過日內瓦的侮辱，也不是揣測之詞的。自然是因慕索里尼的牢獄經驗使他公開表示怕再被監禁起來。有一次他拒絕入卡普利（Capri）的藍穴（Blue Grotto）。他以愛好大房間著稱，如他在巴萊梭（Palazzo Venezia）的辦公室，有六十英尺長，四十英尺寬，四十英尺高，這是多多地補償他少年時之被關在小的牢獄中啊。

慕索里尼於一九〇四年回到意大利，時二十一歲，以後度了十年的激烈社會主義者的生活。

他以教書及做新聞記者而生活。雖然他不是如蕭百納 (Shaw) 或托拉斯基那樣偉大的小冊著作家，而他現在還是活着的最好的新聞記者之一。他最初嘗試一篇創作，叫做紅衣主教的夫人 (The Cardinal's Mistress) 的小說，沒有得到成功；而這篇作品是（我引哈克特 Francis Hackett 的話）『硬性的，劇烈的，譏刺的，傲慢的，有力的，寫來吃力的。』他也寫了一本約翰·胡司 (John Huss) 波希米亞的宗教改革者，一八三九—一九一五，譯者）的傳記。一九一四年在福爾利他創立他自己的報紙階級鬭爭 (La Lotta di Classi)，這個報紙使得全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份子都知道他。一九一二年他任社會主義機關報 Avanti 的編者，在三個月中使得這報紙的銷路增至三倍。以前他在特稜托 (Trento) 意大利北部——譯者）住過，後又在奧國住過，於是恢復舊地主義的經驗喚醒了他性格中的一件重要東西——國家主義。在一九一四年他還是『紅週』(Red Week)

的組織者之一，那是社會主義者在羅馬格納企圖反叛。

歐戰的大禍截去他的社會主義的事業。普通的社會主義者們主張意大利守中立；慕索里尼却贊成加入聯軍作戰。飛納博士 (Dr. Finer) 在他的材料豐富的慕索里尼的意大利 (Mussolini's Italy) 裏說：『要知道他爲什麼變成了一個戰士，用不着做其他的事，只要注意他的體格便够了。』慕索里尼之需要戰爭，是站在政治的國家主義立場，及純粹地個人愛好冒險。他放棄 *Avanti* 的編者職務，被社會黨開除。當他的以前同志們大聲罵他時，他以難能的心理的聰明喊說：『你們恨我，因爲你們仍是愛我呵。』幾個月以後，他創辦一個報紙，這報紙他現在仍然主持，即意大利人民報 (Popolo d'Italia)。法國的金錢——因爲法國熱切要拉意大利加入戰爭——幫助了他。

慕索里尼以前是反軍人的，而到了這時候，激烈地作了鼓吹武力的話。他說：『我們要分別戰爭與戰爭，正和我們分別罪惡與罪惡，血液與血液一樣，我們不是乾屍，我們也不願意做乾屍，永遠不移動的。我們是人，我們是活的人，我們是願意將我們的貢獻，不管這貢獻

是如何的少，獻於歷史的創造的。』而直到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他才親身到前線去，他在戰壕裏只有三十八天便受重傷，這是由於一個軍官的愚笨，他命令他再放一下戰壕日礮，雖然慕索里尼伍長指出這礮已經紅熱。這礮炸裂起來——四個兵士死去，慕索里尼的背後炸傷四十餘處。他在醫院中住了七個月。這至少是這事件的官方解釋。

戰爭告終以後，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慕索里尼組織最初的法西團（Fascio di Combattimento），團員大多是來自以前附和他參戰，主張干涉戰爭的人們。他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他不是一個社會黨黨員；他的第一個政綱便是要對戰爭利益抽百分之八十五的稅。他不歡喜也不信任中產階級及資本主義的貴族階級。“Fascio”是一個意大利字，其意義只是一羣或一束；慕索里尼認為這字可以易於用來象徵帝羅馬的『權標』（Fascos），將斧放在一束棒子的裏面，斧的刃是露出的，古羅馬官吏用來作前導的儀仗，以做權威的標記。——譯者）最初法西黨人的增加，是由於意大利人民報倫巴底（Lombardy）的各地方通信員的加入，他們組織了這個運動。這在最初不是一個黨，而是



一個民團。牠的主要力量爲退伍兵士，尤其是前線的義勇軍（Arditi）。慕索里尼寫着：「我們從前線歸來而沒有死的人，要求統治意大利的權利。」

法西運動發展得很快。牠的根源是和德國所發生的根源一樣，德國後來產生了希特勒。如退伍士卒的失業，民主內閣的衰弱，國會的腐敗，佔有勢力的國家主義的情緒，左傾份子的醞釀，兼對正統派國際社會主義的不滿。慕索里尼勢力大起來，軍隊擁護他，正和德國軍隊之擁護希特勒一樣。小心注意他的一般政客們，力求買通他的運動；基阿利雷（Cio-liti），慕氏未執政時的意首相——譯者）成爲意大利的巴本（Papa），前德國內閣總理——譯者。）工業家們正和德國的情形一樣，準備着取得勝利。

勞工紛爭震動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意大利。工人起來反對不能容忍的工資和生活狀況。當北部工業區六萬工人想奪取生產手段時，慕索里尼最初顯然是擁護這『工廠佔領』的舉動。佔領失敗了，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社會黨領袖的無能。慕索里尼於此更容易地得到羣衆的信仰。至於傳說他把意大利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之中「救」了出來，却

是無稽之談，甚至意大利人現在也不再相信這點了。

到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慕索里尼漸漸地擴張他的勢力，他用了一個武器，這武器後來獨裁都要做傲的——暴動。他成爲好像是一羣暴徒首領。（而他仍是一個很活動的新聞記者；他去參加一九二二年的格來西會議（Cannes Conference）求與白里安（Briand）及魯意喬治（Lloyd George）會晤。他記載說，這一次的旅行教了他國外匯兌祕密中的第一課，他慚愧地發現一個意大利里拉不及一個法國法郎。）慕索里尼的黨人的勢力達到了六縣。巴爾波在非拉拉（Balbe in Ferrara），葛蘭地在波羅格納（Grandi in Bologna），法里涅西在克里蒙納（Farinacci in Cremona），向『赤化份子』進攻。小遊擊式的內戰使意大利發生恐怖。慕索里尼理論上仍自稱爲一社會主義者，但因要奪取政權之故，他須有一個敵人；於是他以『解放』工人爲藉口而向勞動階級作戰。

十足的反動——以及更多的暴動——來自一九二二年十月進軍羅馬（March on Rome）之後。他想做首相，而他不過是一羣暴徒的領袖，以勢力大起來恐嚇了政府，使政

府屈服。一直等到他十分確信軍隊不反對他，及他知道意王一定會任他爲首相，他才要求十足的政權。進軍羅馬自然不僅是向羅馬進軍，法西黨人佔領了許多城市，而國家的軍隊『中立』，袖手旁觀。慕索里尼乘着臥車入羅馬城，已經集在羅馬的五萬法西黨人第二天安靜地被解散了。

一一

一九二二年後，慕索里尼的歷史是大家熟悉的。他初組織了一個聯立內閣，以後取消非法西黨人。如十年後的希特勒一樣。他得到摩根 (Morgan) 借款的援助。直到一九三五年的阿比西尼亞戰爭時爲止，他的僅有的嚴重危機爲麥體奧第事件 (Matteotti affair)。現在大多的批評家不認爲這個意大利領袖會直接發命令刺殺社會主義領袖麥體奧第；但是他的道德上的責任是無可推諉的。深知消息的人想，人們所以稱慕索里尼刺殺麥體奧第，因爲發生了這會事：慕索里尼不僅在下院中威脅麥體奧第，而且私下發怒地責罵他，一提到他的名字則激怒起來。人們可以容易地想像慕索里尼對他的屬下大聲地說：「

麥體阿第那傢伙……！』(同樣地，亨利第二 Henry II 偶然講了一句話，引起比克特 Thomas à Becket 的被暗殺)他的屬下得到這個暗示，爲求得到領袖的歡心起見，自動地幹起來，却去這位青年社會主義者而將他暗殺。這種剷除反對黨的方法，無論是審慎的或不審慎的，對於一個獨裁者總是有利益的；如果這個事件的結果『好』，那自然有好處，如果這個事件的結果不好——造成了一種誹謗——那獨裁者可以否認同謀。而慕索里尼是大膽地承認他的責任；他承認暗殺者是『高級』法西黨人。他的幾個最密切的同志實在是有關係的。在對下院的著名演說中，他大聲地作下列的話：

諸位，在羅馬皇帝提多斯 (Titus) 的神靈之下，我們爲新羅馬帝國而奮鬥的人，難道要找什麼辯明嗎？我在這裏對議會之前，對一切意大利人民之前，宣佈我——一個人負一切發生事件的政治、道德、歷史的責任。如果敵人的反宣傳的力量足以絞死一個人，那末讓他們來絞我好！如果法西主義只不過是蓖麻油或一根棍棒，而不是意大利青年的最好的足以自豪的熱情，我承受任何的責罵！

我們可以注意，這是與希特勒在六月卅日暗殺之後，所用的手段是一樣的。希特勒也負一切的責任；在意大利和德國都是這個方法免去了多數人的良心不安的責任。而麥體阿第事件使慕索里尼的內心戰慄。這事件也惹起他的最卑鄙的行爲。

（前任政府出版部主任羅西 Cesare Rossi 爲上述事件最直接連累者之一，逃出了意大利，放肆談到這件事，慕索里尼派一隊法西斯黨人到瑞士的邊境，將他拿捕，判了三十年的徒刑。而真正刺麥體阿第的兇手們則得到很輕的處罰。其中之一爲一個原籍聖路易 St. Louis 的美國暴徒。）但總而言之，此次事件於慕索里尼個人是有極大利益的，因爲在此以後他可以使敵黨的人們陷於孤立，於是更容易地摧殘他們。

在此次阿比西尼亞戰役的時候來追溯一九一——二年的意土戰爭，是很有趣的，因爲我們記得慕索里尼竭力反對那次的戰事。那次戰爭也是在非洲，慕索里尼其時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認爲那戰爭爲一個帝國主義的罪惡。他在福爾利組織了一個反戰罷工，結果被關在監牢裏六個月。他當時寫着：利比亞戰爭（The Libian War）及其所引起的

報紙文章，都是『表現國家主義的特殊狂熱病。』

在 Avanti 的一篇評論裏，他寫了下列的一段，這在一九三五年之末讀起來是令人不禁稱奇的：

我們是在一個國家主義的，宗教的，保守的意大利裏，她要將武力變成法律，將軍隊變成全國的學校。我們早就預見到這破壞道德的行爲了；我們並不稍爲驚異。但是一般以爲偏重的武力便是強盛之兆的人是錯誤的。強盛的國家並不是開倒車退到今日意大利人的瘋狂似的歡樂裏；強盛的國家有平均發展的觀念。國家主義的崇尚武力的意大利表示她缺少這種觀念。因此發生將一個不幸的侵略戰爭當作一個羅馬的勝利來慶祝這回事呵。

飛納博士發現了一句同樣性質的名言。一九二二年慕索里尼激怒地寫着：『只要你想像一個意大利，在這個國家的裏面三千六百萬人一樣地思想，好像他們的頭腦是一個模型造成的，你便可以找到一個瘋人院，或一個十足煩悶或癡呆的國家了。』

對於那話，一個旁觀者可以回答，對呵！

大多見到慕索里尼的人，都以他的漢子矮短而驚異。他像拿破崙一樣，只有五呎六吋高。他的兩肩是很有力的，他的雙手是很美的，差不多是細嫩的。他的笑中有剛毅的神氣。平常他穿上了法西軍隊的伍長的制服，（注意他的拿破崙的意味。）他在羅馬中心的巴萊梭工作，而住於離那裏乘車只要十分鐘的地方，即托爾羅涅別墅（*Villa Torlonia*），那是一個很安適的別墅，在靠近坡爾塔·皮愛（*Porta Pia*）的維愛·諾曼特那（*Via Nazionale*）有一個花木繁盛的花園。一個名叫托爾羅涅親王的羅馬貴族，以前將這個別墅奉贈慕索里尼，因為他不能夠維持這個別墅了；現在他很想收回，但是慕索里尼已經愛上了這個地方，尤其是愛上了這個花園。

他的妻杜娜（*Donna Rachele Guidi*）在好幾年中實際上是等於被關在米蘭（*Milan*）做流犯，但是現在住於托爾羅涅別墅。杜娜的家世是不大明白的，據一個傳說，她是福爾利一酒館的女招待，據另一傳說，她是慕索里尼父親不做鐵匠後所雇的女用人，據

第三個傳說她是他的父親元配所帶來的女兒，就是這位法西黨領袖的義姊。她給慕索里尼生了五個孩子。

慕索里尼實是現代獨裁中顯然多子女的唯一的人；他也是很注意家庭生活的唯一的獨裁。如拿破崙（及興登堡）一樣，他信任他的近親，他所信任的其他的人是不多的。在從前許多年他的僅有的朋友是他的兄弟阿納爾多（Arnaldo），他繼慕索里尼為意大利人民報編者；慕索里尼幾乎每天早晨要從羅馬打電話到米蘭給他。阿納爾多的猝死對於這位法西黨領袖為一重大打擊。他的女兒愛第（Edda）是他的一個活模型，為唯一的敢責罵他的人，他寵愛她。她的丈夫西艾諾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任慕索里尼的報館理事，後來為領導第斯皮拉他（Disperata）隊擲彈飛機與追逐飛機往阿比西尼亞的領袖。慕索里尼的兩個大兒子，維陀里俄（Vittorio），現在十九歲，與白魯諾（Bruno），現在十七歲，也到戰場作飛機師了。（註）好像是使他的兩個年幼的孩子羅馬諾（Romano）及馬利（Maria）接觸天空起見，慕索里尼自己司一隻飛機，帶着他們坐在裏面，給



予他們離開地面的第一次經驗。

【註】譯者按他們兄弟二人因侵東非（阿國）有功，擢升上尉。

慕索里尼是五十二歲了，而身體是非常的強健的，一部份是因為他注重嚴格的鍛鍊。在他就任首相未久，他胃病害得很厲害，他現在除牛奶與水菓外，其他東西吃得很少。他指着一藍置放在桌上的水菓，對一個最近的美國訪問者說：『那便是我保持健康的秘密——水菓，水菓，水菓。早晨我喝一杯咖啡及水菓；中午我吃湯及水菓，晚上我又吃水菓。我不與肉類接觸，但有時我吃一點魚。』他愛好運動，運動得很多：在托爾羅涅花園騎馬；劍術，游泳，徒步行走都來的。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煙。他在年青時代愛女人，但近數年來一點不注意她們了。

慕索里尼的身體像一個鋼的發條（比較起來，斯達林像一塊睡形花崗石，希特勒像生物原質外層的一個小斑點。）慕索里尼的禁慾是一個強漢的禁慾，他看不起縱慾，因為他已嘗够了，知道那會使他的身體變弱；希特勒的禁慾是一個弱者的禁慾，恐怕受誘惑。斯

達林則對於嗜慾是正常的，如同一隻水牛一樣。

這位意大利法西斯黨領袖是沒有社交生活的。當他身兼外交部長需要招待賓客時，他不在巴萊梭或托爾羅涅別墅歡宴他們，而是臨時租用一個旅館。他厭恨富翁，輕視驕奢淫佚的羅馬貴族。他從前是歡喜到戲院去，但現在改了這個習慣，因為他不能化費這種時間；有時他在家中私自開映電影。他在一九二八年所寫的自傳裏，說自他執政六年以來，他沒有一次走過一個貴族的沙龍的或一個咖啡店的門檻。

普通慕素里尼每天作五六小時的忙工作——除非有重要事故則增加工作的時間——其餘時間化在讀書，默想，或運動。他是愛清潔的，墨守成規的，做事有次序的；如盧得維喜(Ludwig)所記載的，他恨隨隨便便。他的工作即一點小小事件都很有系統，以他的多方面性格而論，他是一個完善的行政者了，他一直要等到他一天的工作做完，才離開巴萊梭。

他很不注意金錢的，雖然他的大家庭使他對於經濟的考慮，較其他獨裁者為急切，他

的正式薪金每月是八千里拉（約合羅斯福金元六六〇元），但是他在財政處有一個『小的普通活期』存款。他的自傳在美國得到二五，〇〇〇金元；這筆款子的大部份是用於救濟羅馬的窮人。在一個長時期中他的主要所得的來源爲從赫耳斯特報館（Hearst Press）每星期得到一五〇〇金元，而在一九三五年之初他放棄了按期寫文章，因爲國際政治異常複雜，他不能坦白地談話。他將從赫耳斯特報館所得來的錢分一部給替他寫傳記的沙法雷（Margherita Sarfatti），他協助他預備文稿。慕索里尼的兄弟阿納爾多是有錢的，因爲意大利人民報從前是——現在還是——一個賺錢的報紙，牠的理事現在是慕索里尼的姪子。

慕索里尼是與宗教妥協的唯一的近代獨裁。一九二九年拉特藍條約（The Lateran Treaty）規定了意大利的宗教與國家關係。以後不久慕索里尼與教皇，兩個都是性情剛強的人物，因法西青年的教育問題而衝突起來；一九三二年這法西領袖往法迪坎（Vaticani）譯者按係教皇的國家）去，跪下來禱告，大家相信他參加了聖餐禮。他在青年時是——

個堅決的無神論者，和他的父親一樣；後來他變爲很相信宗教。他現在每天禱告。他給予愛第的結婚禮物爲一粒金的禱告珠；他的最幼的孩子馬利是第一個被給予一個宗教名字。

慕索里尼是歐洲政治家中最易於接近的一個人（捷克斯拉夫的貝納斯總統 Beneš 也是如此），他接見了許多的人。每天第一個見他的人爲警察長（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王同樣地接見保安官爲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這位法西黨領袖是很好奇的，對於人性抱有興趣，他如羅斯福總統一樣，是一個頭腦無孔不入的人，以接見賓客爲樂。飛納博士說他已經和六萬以上的人談過話；參加了一，八八七，一一二件個人的『公民事件』而引以爲津津有味。

慕索里尼注意聽着人們對他說話——但他很少接受忠言。他是一個人獨行獨斷的。當他意志決定的時候，他可以使人不可接近他，有如西藏的喇嘛。在一九三五年日內瓦危機的期間，當他大發雷霆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能夠走近他。阿羅意西男爵 (Baron Aloisi) 及其他的人們作報告；他聽不聽是由他的高興。羅馬的幾個外交家，如英國大使杜蒙爵士

(Sir Eric Drummond) 不歡喜和他談話；因為他往往使他們驚駭起來。慕索里尼是以認識千萬人自豪的，而阿納爾多死後，——沒有朋友了；他告訴盧得維喜說：『沒有一個人』他信任的。(盧得維喜的書的意譯本中這句話刪去了，因為許多意大利人對於這法西領袖作忠誠的服務，他們以為他們應該得到他的信任的。)

他自己是一個很好的新聞記者，所以歡喜新聞記者。但是人們需要細心地應付他。他是向來不愛『媚態』的；除了最有技術的阿諛外，他對於一切都輕視；他是粗暴的，快樂的，高聲的，或剛毅的，視他的心境而定，他毫不虛飾或隱藏他的心境。他常去訪問那些善於說話的人們，以示敬意；有時他問的問題較他所回答的為多。要想得到他的好感，勇敢是一條最好的道路。我記得看見哈克特代表圖表縱覽雜誌 (Survey Graphic) 見了慕索里尼以後，有點氣喘的神氣，因為他敢問了一個十分大膽的問題：『假使你也遵行法西美德，如紀律，忠誠，和服從，你的事業會到了什麼地步呢？』

慕索里尼知道接見訪問者是最好的一種宣傳方式；因此他對於訪問者樂予接見。大

多數的記者——及他們的主編——和一個獨裁或國家元首談話之後，便以為受了隆寵；他們一被慕索里尼或希特勒接見以後，便感覺一種責任，使他們改變他們訪問的目的，一個忙碌的要人化了一個鐘點與一個通信員作友誼的談話，普通他是很難在通信裏說他的壞話的。

一個英國記者最近訪問慕索里尼，慕索里尼對於這記者所說的一句話笑了起來，這是少有的現象。這記者起草關於這次訪問的通信裏寫着：「這位法西黨領袖的笑，引起我對法西制度作一個批評，就是這個制度是極少允許幽默的表現。」在這通信未發表之前，交於慕索里尼先看以得到他的許可時（大多的訪問通信他是要看的），他刪去關於他的笑的事實。獨裁者是永遠不笑的！

只有兩個記者使得這位法西領袖公開受窘；這也是僅有的記載下來的事。一九二五年的安全條約，是他到洛加諾（Locarno）去簽字的。（自一九二二年而後，他偶然地離開意大利共有三次，這是三次之一；他參加那一年的洛桑會議（Lausanne Conference），

一九二三年急急地遊歷倫敦。他的黨正接收了意大利的許多家自由主義的大報紙；國際通訊各集團都怨恨這件事，於是抵制他所召集的記者會議。這次慕索里尼坐在旅館的會客廳裏，爲一般從前對他表示輕視的記者們所包圍，感覺煩惱，怒形於色。他稱倫敦每日新聞報（Daily Herald）的斯羅公比（George Slocombe）爲一紅鬍子人物，他與他在格來西會議遇見過的慕索里尼以粗暴的神氣大聲叫起來：『哈哈，你的共產朋友們近況怎樣！』斯羅公比以十分好的性情回答說：『首相先生，我不是一個共產黨人，而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慕索里尼用鼻聲再說：『哼！那末我算錯誤了。』於是荷蘭記者尼披耳斯（George Nypels）以尖的聲音說：『而這並不是第一次呵。』

慕索里尼總是一天到晚看書，除了馬沙克（Masaryk 譯者按：前捷克斯拉夫總統）以外，沒有一個近代政治家有他讀關於近代潮流的書報那麼多。他所讀的東西都抄在一本有系統的筆記本上。他的歷史知識之淵博與正確使盧得維喜爲之大吃一驚。如大多數歡喜讀書的人，他歡喜寫作，而寫得十分地好。他將法西斯主義縮短在他的十二面的小冊裏，

而要言不煩，等於希特勒在『余之奮鬪』（Mein Kampf）裏六六面所說的話。他自是獨裁者中的最有知識最詭辯者——他是僅有的能稱爲智識階級的近代統治者——他自修法文和德文，說得都非常純熟。約在一九二五年他起始學習英文，以期得讀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的政治評論。他選了一個羅馬的通訊員做他的教師。他寫得很多——匿名的——在意大利人民報發表，他是麥吉阿空地（Campo di Maggio）戲劇本的著者之一，那是講到拿破崙『百日』的故事，他又著了一個劇本，是關於他的主要英雄愷撒大將（Julius Caesar）的，但未曾表演過。

慕索里尼最恨的是希特勒，貴族，金錢，貓及老年人。他厭老人，尤其是老太婆。他不歡喜人家稱他是一個祖父；當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他的五十誕辰的時候，意大利報紙不許記載這回事。他最愛的爲羅馬城（是他努力養成『羅馬的崇拜』的），他的女兒愛第，農民，書報，飛機，和迅速。

他善於乘機器腳踏車，如最近逝世的羅溫司上校（Colonel Lawrence）一樣，夜間



在鄉下開着走。歐戰結束不久他便學習開飛機，在他的自傳裏詳述他的飛機遇到許多次猛烈落地或被迫落下的事實，神奇似地他得免於難，使他感覺深深的愉快。

#### 四

從慕索里尼複雜性格裏，我們可以找出牠的線索，這線索是表示他的權力的來源。

他第一有骨格與勇氣，在他的國家中有時這兩樣都欠缺的。雖然他大言不慚，而他的智力是冷靜的，分析的，演繹的，深切地現實的。他的熱情的自私自義，即神怪的自私自義（*Sacro egoismo*）是意大利人民都抱有的。他的虛榮心顯然地到了極端；譬如他規定十九個里拉等於一塊金元——這定價太高了——目的純粹是想要比法國人所定的價率好一點。早在一九一〇年他便有瘋子之稱。

他完全是一個幹的人。關於德國六月卅日事件，有一段事使他驚異，即希特勒費了五小時與一個潛伏的賣國賊（魯姆 Roehm）談話。他的直覺力，個人的與政治的，都是感覺很靈敏的。他說『我不能改變我自己。我像野獸一樣，天氣轉變之前我便嗅到了。假使我服

從我的本能，我永遠不會錯誤。』他是一個用筆的演說家。他以寫文章而取得政權。

如一切的獨裁者一樣，他是難以寬恕他人的。希特勒，斯達林，慕索里尼向來沒有原諒過一個敵人。他不是一個僞君子。他向來沒有隱藏他的野心，他的野心，如他告訴盧得維喜的，是取奪政權，政權盡量能夠維持如何長久，即至如何長久。在另一方面他說他不再是「愛國主義的得利者」了。對意大利要盡責任成爲他的情感。他有一次問：『是不是渴求權勢的慾望佔據了我呢？』『不是，我相信以良心而言，沒有意大利人這樣想的。甚至最恨我的敵人也不這樣想。是由于我的責任呵。一個對於革命與對於意大利的確定的責任。』

他的舞台本領是很大的。沒有一個近代的政客，也許可以除去托拉斯基，是能及得他那樣好的演員。

他顯然地對於政治有一種『世界眼光』如君特（Frances Gunther）所指出的。希特勒把德國當作一個另外的世界；慕索里尼則很知道除了意大利以外，世界包括的領土還很多——這使他陷於煩惱。

最重要的，他的身體是富于情感的，是生出吸引力的，他的活動力在各種姿勢都表現出來；如當他行禮時，他用力伸出他的手臂，以致你會想他的手會要斷。這種活動力是馬上爲他人所吸收的。當他到了被檢閱的軍隊之前，他差不多有一種電擊的力量。

在慕索里尼的較反面的性格中，可以舉出下列幾點：

他是深切地暴躁的。一個他很熟悉並且欽佩的記者，于一九三五年八月遊歷意大利，於是寫了一個很客觀的故事，說對阿比西尼亞之戰並不是全世界都同情的。慕索里尼看到這段文字（他的剪下來的報紙他大半都讀，）遂取消與這記者的會晤，這正是在會晤要發生的數小時以前。他又因爲一件很小的事，禁止了幸運雜誌（Fortune）的意大利專號，大家相信大部份原因是由于引用了他少年時的一句話，這話如下：『當我一醒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呢？馬上就跳起床！不管枕頭上靠近我的那面孔是如何的漂亮。』

他是迷信的。在他事業的初年，在贈送給他的數千的禮物中，他接受了一個埃及的木乃伊。後來坎拿爾爵士（Lord Carnarvon），杜坎哈蒙墳墓（Tomb of Tutenhannon）

的開掘者，死去了。慕索里尼吩咐將這木乃伊移去。他喚醒巴萊梭·契吉（Galazzo Chigi），他那時在那裏工作）的僚屬，馬上就將牠移去。他畏懼木乃伊深夜來到他的面前。他的畏懼坐牢我曾提起。也許是他歡喜快速而猛烈的動作是他從前坐小監牢中行走不過六呎長四呎寬的地位的酬報。

他不是一顯然的獨出心裁者。差不多他一切的思想是從別地方得來的。意識上法西主義是馬克斯·尼采，索勒爾的理論歪曲造成的。慕索里尼並沒有發明法西的舉手禮，這是丹嫩齊奧（d'Annunzio）建議的；黑衫團（The Black Shirt）的黨徽也不是他設計的，這是他從前線義勇軍的制服抄來的。而他有時是謙虛的。他告訴盧得維喜說：「一個人在我的地位至少一星期要發呆一次。」

慕索里尼知道他的性格的複雜性，一個法西報紙上連着登載討論牠的文字，他讀來津津有味。他於是打了一個電報給那地方縣長：「請叫那編者來，告訴他用下面這番話以作他的連載文字的結論：『因為慕索里尼自己說他不能準確地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個

人，他人自是難以找出的。」

哈克特于一九二六年遊歷羅馬以後，他寫着：『慕索里尼是一篇意大利的傑作，一切黑暗方面與光明方面，具體的，勇敢的，和可觸覺的，都包括在內。描寫山靈的暴怒之許多恐怖劇本中的一頁，這在英國則以巴力門山（Parliament Hill）爲歸宿，在意大利則以維蘇威火山（Vesuvius）爲歸宿。慕索里尼是一個維蘇威人。他在一瞬之間，能怒髮沖冠大發雷霆，任意說一段惡笑話，而結果也許是煙霧，火山，破滅。』哈克特寫這段文字時腦中想到科阜（Cortu），八年以後就是阿比西尼亞了。

## 五

慕索里尼的第一次發表的文字，是二十一歲時寫的，其時正深深地受到尼采的影響，是一篇關於武力哲學的論文。武力的概念總是迷惑着他；他以武力統治，他承認這回事。然而如他所說的，暴力應該要是用作『割療』的，不是拿來『玩耍』的；他解釋恐怖之在意大利是一個『國家的預防藥』，他寫着某種『個人之應該使其不活動，正和醫生之不許

一個受了傳染病的人活動一樣。』一九二一年之初，因某一件事他辭去法西運動的領袖（爲期極短），因他反對遊擊隊（Squadristi bands）過度的暴動。而他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才取消遊擊隊，其時他們所做的蓖麻油和棍棒工作安全地完成了。

慕索里尼對於暴力問題加以考慮過的意見是如下，這我從飛納博士的文字裏引來的。

歷史上有一個政府完全依照民意而不用任何武力嗎？那樣的政府從前沒有過的，將來也決不會有。同意是常常改變的，有如海邊沙灘的構成成份一樣。我們不能永久有同意的。也不會有完全的同意。向來沒有一個政府使一切人民都快樂的。對於任何一個問題，不管你給予牠的解決辦法怎樣，即使你有神的聰明，你總要造成一階級的不滿意份子……這不滿意會傳佈而危及國家的團結，你怎樣去免除牠呢？你一定要用武力免除牠……當需要的時候，鐵面無情地應用武力呵。奪去任何政府的武力，而只給予牠永久的原則，則這政府要爲第一個志在推翻牠的集團所支配。

企圖行刺慕索里尼的事有五六次；他是一個很相信命運的人，但他不是專門相信命運，而不作嚴厲的防衛。他告訴盧得維喜說一八二六年布羅格納（Bologna）的『精神壓迫的空氣』警告他一個暗殺事件會要發生。據說羅馬只有一個人，即警察長，能夠或不能夠告訴慕索里尼要做什麼；關於走那一條路，慕索里尼是服從他的。羅馬有幾條路慕索里尼向沒有走過。在另一方面，他每天由家中到辦公處是不要特別的保衛。

據說希特勒放一根小手鎗在他的公事桌的抽屜裏。假使他的統治崩潰，希特勒會自殺的。但是意大利的法西領袖則不然。慕索里尼為一個結實的大猩猩，不會用那敏捷方法來毀滅自己的。

## 六

一九三五年十月，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開始。慕索里尼冷血似地出發了，『破壞他曾宣誓擁護的盟約，劫掠與征服他曾承認保衛的國家。』

好多年來他威脅着要向東方發展。這次戰爭應該不使人驚奇的。他曾以貪饞的眼光

對着突尼斯(Tunis)蘇俄與土耳其的協定阻止了他數年前在阿那托力亞(Anatolia)的冒險。他需要土地——殖民地——以爲意大利的對外發展。但是他的虛張聲勢的習慣不幸使西歐人民相信他只是在恫嚇。

他何以選擇阿比西尼亞爲他的冒險嘗試，來證明他的行動較威脅更兇狠呢？最簡單的原因是意大利成長過遲，不能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並駕齊驅取得殖民地，而阿比西尼亞却是剩下來的唯一的領土。爲什麼阿比西尼亞沒有受到英法的注意呢？因爲在這個國家歐洲人來殖民是不合算的，天然財源是成問題的，而尤有甚者，那難以攻克的好戰部落要以武力克服簡直爲一件困難的事。對於意大利的戰事固然沒有人歡喜的，但是不要以爲阿比西尼亞人是一種溫文爾雅的，或令人可愛的民族。

慕索里尼早有侵阿之意，爲什麼又選一九三五年爲動手的時期呢？我們在這裏要停一下，來敘述意大利的基本經濟實況，這實況有的是由於慕索里尼，而有的沒有慕索里尼也是要存在的。



意大利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口，如法國一樣的多，而擠在等於法國三分之一的可耕種的土地上。人口增加達到驚人的總數，每年生育有四五〇，〇〇〇之多。慕索里尼自己這樣說：『我們非常需要土地，因為我們生育力量是很大的，我們願意生育力量大。』在四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絕對大多數人致力於農業；全國只有百分之十是從事工業的。不識字的人口不下百分之二十一。國家是很缺少原料；牠沒有橡皮，錫，鎢，雲母，或銘，牠倚靠由外國輸入百分之九十九的棉花，百分之八十的羊毛，百分之九十五的煤，百分之九十九的鑛油，百分之八十的鋼與鐵，百分之九十九的銅。雖然慕索里尼有『糧食戰爭』，而意大利不能產生足夠的食物以供本國的需要；他要輸入百分之十五的肉，和百分之二十的麥。最後，除了日本以外，意大利有世界各國家的最易受危險的海岸線。

法西主義最初數年中慕索里尼的工作普通是企圖改變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成爲一個偉大的強國。他成功了，但是費了可怕的犧牲。租稅增加，一直達不到下國家整個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國際貿易方面入超很大。預算的不足是每年增加，一九三〇—三一年不

足數目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一九三二—三三年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一九三三—三四年爲國家全部歲收的百分之二十五。阿比西尼亞戰爭未開始之前，戰爭的預備耗費爲二十萬萬的里拉，約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意大利的存金去了一半，慕索里尼曾發誓要維持里拉至他的『最後一滴血』，但終於被迫要放棄金本位。倫敦十二月間里拉跌到九二折，三個月以內的期貨交易的時價(Forward quotations)跌了六折；換言之，各銀行因爲在初春意大利的國幣一定要跌到六八折，所以願意和任何人打賭任何大的數目。

克涅克布克(H. R. Knickerbocker)及湯布森(Dorothy Thompson)曾指出，在獨裁政治之下，民主政治國家所施行的經濟法律是要終止的，這是很對。希特勒或慕索里尼能够玩弄金錢，而在普通放任的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希特勒與慕索里尼之下，經濟純粹地成爲一個政治問題；僅有的問題是人民能忍受獨裁控制的殘暴束縛到什麼時候爲止而已。雖然如此，而一九三四年之末與一九三五年之初的意大利內政情形已

使得「移目向外」成爲必要，「移目向外」是獨裁者們的慣技。慕索里尼不應該作戰的原因，正是他要作戰的原因。「這不是他能否作戰的問題，而是他能否不戰的問題。」

然而我並不認爲慕索里尼（他像希特勒一樣，對於經濟不大有興趣）之貿然作戰，完全是由於經濟的原動力。他們兩人都是深受政治的國家主義的原因的推動。慕索里尼並不認爲國家的殖民地，或邊疆顯然有解除經濟困難的功用。他的腦中很想到奪取他人的領土以表示政治的尊嚴。讀者不要忘記倫敦秘密條約引誘意大利背棄三國同盟，而參加歐戰，倒在聯軍方面。根據那條約，意大利要有較她後來所得分贓爲多。

慕索里尼的外交政策，大概而言是失敗的。他有一種困難的模稜兩可的工作；意大利雖爲戰勝的國家之一，同樣地要修正條約；法國阻止他向突尼斯發展；他的侵入阿爾巴尼亞（Albania）是一個費錢很多而並不大生利的實驗；他的四強公約基於修正和約者的觀點而求組成一種二十世紀的神聖同盟，產下來便死去了；他是因失去德國的友誼而使奧匈成爲他的勢力範圍的；在阿刺伯戰爭中他錯鼓動了一方面；他力求巴爾幹這鍋燃

燒着，而他歸於失敗，這失敗是由於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土耳其，和希臘以巴爾幹公約聯合起來反對他。

但是僅是政治尙不足引起戰爭。法西主義的氣候是烈熱的。如一切的獨裁者一樣，慕索里尼是一個『愛好威名的人』。他總是要找點事情做。在世界的報紙標題上，希特勒竊取了他的許多地位。他本性是個武士及帝國主義者；他稱『帝國主義爲生命的永久不變的原理』。他又知道自大戰以後所生的意大利人已經成年了，而疏忽了意大利人的悲慘情形，只知好戰的威脅與期望；而且，戰爭也許可以解決失業問題。每個合理的或客觀的理由告訴了慕索里尼，一個極頂聰明人，阿比西尼亞戰爭是一件困難而危險的事。在歐洲政治中，意大利永久地被注定要倚賴大不列顛，因爲她的易於被人攻擊的海岸線，及英國軍艦控制地中海，這久已成爲不待辯明的事實了。而慕索里尼嘲笑這所謂不待辯明的事實。這是表示個人性格或個人誇大狂在政治中之重要的一個有趣味的例子。慕索里尼並不爲在阿比西尼亞的地質學者的悲觀報告而驚慌起來。他知道他的主要收穫是什麼。

——光榮。

另一個原動力爲那個稱爲國家『榮譽』的那難以了解的概念。同是這個原動力使得希特勒在德國得勢。意大利人仍悲痛阿多華（Adowa）的恥辱，一八九六年阿比西尼亞人殺了他們許多人，以及蓋布里多（Caporetto）的恥辱，他們慘被奧德軍戰敗，這是一個西歐國家在大戰中所遭的大敗。慕索里尼如希特勒一樣，是在報復前恥。他好像是坐在血盆上而來恢復意大利的自尊心。

## 第二章 希特勒

「一人而兼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是世界上的非常人物；這才是偉大呵。」——希特勒

—

似乎是沒有理性而自己矛盾的阿多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爲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一個不容易敲碎的硬殼果。許多人看起來，他是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但是他將六千五百萬人民握在他的手裏，這六千五百萬人民中很有一部份以奴隸姿勢來崇拜他，這種奴隸狀態是包括愛好，畏懼，和愛國的成份。很少人像他那樣由有尊嚴而到可笑的整個階段的。他是一個騙子，一個煽動家，一個遭失敗的患歇私的里亞者，一個不相配的幸運兒。他又是數百萬誠實而頭腦清楚的德國人民所極端尊敬的一人。他的非常力量，是從何而來呢？

這位腹部大，有卓別麟式的鬚髯，慣於失眠症和情感主義的人，國社黨的黨魁（國社黨 Nazi Party, Nazi 的意思即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譯者），德國海陸軍的元帥，德國民族的首領，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的創造者，總統兼總理，於一八八九年生於奧國。他並非生而為德國人。這是很重要的事實，因為這個事實而燃着他的初期國家主義之火。他為邊疆居民，為被逐出國境者，於是發展了他的這種不可解釋的愛國主義。只有一個奧國人才能那樣懇切地接受德意志主義（Germanism）呵。

他的想像力純粹是政治的，我曾看見過他少時對所繪的圖畫，即他做男孩時送交維也納藝術學校的圖畫。這些圖畫是散文式的，完全沒有韻律，色彩，情感，或精神的想像力。牠們是技師的簡略圖：繪時是很費功夫的，圖也是準確的，然而此外便沒有什麼了。無怪乎維也納藝術學校的教師叫他入建築學校，放棄純粹藝術，因為對於純粹藝術他沒有希望。他僅入了一個普通學校，無論我們的態度怎樣寬大，他是不能稱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不如慕索里尼那樣地有學問，那樣地對於知識發生興趣。他差不多不讀書。凡爾

賽條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也許是對於他的人生發生了僅有的具體影響；但是他是否讀完那條約的全文還是可疑的。他不歡喜知識份子。自他少年時會居住奧國以後，後來便住在德國而沒有離開過，（假使你除去他在法蘭德斯 (Flanders) 的作戰經驗，及一九三四年在威尼斯 (Venice) 與慕索里尼短時期的晤面，）他除了說幾個不清楚的法國字外，不能說外國話。

對於許多見過希特勒的人，他似乎是不十分文雅的，他沒有一定的態度。他感覺得當機立斷是一件困難的事。他不是一個沉默的人。

外國人，尤其是英美報館的訪問者，也許覺得他是誠懇的，甚至坦白的，但是這些訪問者沒有機會問他的問題，沒有機會和他作問答式的談話。希特勒歡喜說話。他是極端地情感的。他總不回答問題。他對你說話，如同你是一個民衆大會一樣，沒有東西能夠停止他的言語的湧出。

某時以前，在簽訂波蘭友好公約之前，他接待一個著名的美國政治家兼編輯。他發出



這樣的一個問題：『假使，譬如說，墨西哥是波蘭，而因墨西哥的一個「走廊」關係，美國的得克薩斯（Texas 美國西南部——譯者）被割斷了，美國人的感想如何呢？』這位美國的政治家回答說：『那個問題的答案是加拿大並非法國。』希特勒是有意地發此問題，且修辭方面加以修飾，這美國政論家的插話使得他大為驚異，經過許久時間他才能恢復他的整個音調來談另一問題。

曾有一個時期，許多人說希特勒最好的特性是忠實。人們常說的戲言是：他決不會捨棄三樣東西：猶太人，他的朋友們和奧國。現在沒有人再作那種戲言了，因為作那戲言的魯姆上尉（Captain Roehm）業已死去。

對於幫助他成功的人，如雷克斯勒（Drexler），費得爾（Feder），斯特薩（Strasser），他一個一個地消滅了他們，而他對於他的某些僚屬，即那些向來沒有和他不一致的人，完全給他絕對服從的人，是忠實的。

他的體格上的氣力是可爭辯的一點。當一九二三年他的一般人在慕尼克暴動（Mu

nich Putsch)中被鎗射擊的時候，他出力地在街上奔走，用力太猛烈了，以致他的肩部破裂。國社黨對於這件事有兩種解釋：(一)他與另一個人攜手偕行，這人在他的右邊，被子彈擊死，他不知不覺地在地上跳起來，以致肩部破裂；(二)他的舉動是前線老兵士的反射作用，即當子彈飛來時，有心地睡倒，肩部因之破裂。

希特勒告訴他的一個熟人他自己的帶有點神秘性的故事，在那種神秘環境中，他榮得了鐵質十字章。他在歐戰中是一個傳達信件的人。他帶着信件經過一塊人所不知的地方，那裏大家相信不會有敵軍，而他聽到法兵的聲音。他是單獨一個；只有一支手鎗；所以他心神一定，他用想像的口令，對一排想像的兵士發出，法兵聞之戰慄，他們一共有七個人從那荒郊的隱蔽地方走出來，每人舉起雙手。希特勒一個人把這七個人都帶到德軍的戰線。告訴他的談話者這個故事時，他說他深知道如果這七個人不是法國人而是美國人或英國人，這個把戲一定不會成功的。

那一類的誇大以及他的自信心，是非常巨大的。那末當他接見每日郵報 (Daily

(Mail) 記者時，他作一種談話，稱國社黨革命只犧牲了二十六條生命，也許他是十分『誠實』吧！他絕對地相信他所說的話，——至少是當他說話的對候。

## 二

希特勒現年四十六歲，身體並不頭等好。在過去的一年，他增加了十二磅體重，這從他的頭頸和橫隔膜可以表現出來。他到一個地方不大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做孩子時便有肺病，在上次大戰中他的目光爲毒氣所害。

一九三五年八月，德國忽然宣佈數月以前，領袖因被施一個小手術割去他的聲帶（Vocal cords）一粒血肉而受着痛苦。這次施手術是成功的。而九月間希特勒使他的在努連堡的左右大吃一驚，他用富於情感而婉轉的聲調，暗指他死的可能性。他說：『我不知道我何時最後合起我的雙眼，但是我確實知道我的黨要繼續生存和統治。領袖們生生死死，然而德國總是存在的。……軍隊要保持德國所有的權力，並注意這件事。』這話引起許多

謠言（但毫末證實），稱希特勒的咽喉長壞了，他生了毒瘤。

他不作運動，他僅有的重要娛樂是音樂（雖然他近來起始在波羅的海或北海作乘巡洋艦之遊）。他深深地愛好音樂。瓦格涅（Wagner，德國作曲家，一八一三—一八八三—譯者）是給予他的人生極重要影響的一人；他為瓦格涅所迷惑。他有時間能到歌劇院去，他總是要去的。德議會的開會是在克羅爾歌劇院（Kroll Opera House）舉行，有時會議結束時完全表演瓦格涅的歌劇——對於不愛好音樂的議員是很討厭的。

當他夜間感覺疲倦的時候，於是將他的友人兼嬖臣漢夫斯塔恩格（Hanfstaengl）召入，漢夫斯塔恩格遂玩弄音樂，使希特勒睡覺，他有時奏叔曼（Schumann，德國作曲家，一八一〇—一八五六—譯者）或味第（Verdi，意大利作曲家，一八一三—一九〇一—譯者）的歌譜。但泰貝多芬（Beethoven，普魯士作曲家，一七七〇—一八二七—譯者）和瓦格涅的歌譜的時候為多，希特勒之需要音樂，差不多把音樂當作一種不可缺少的

藥。漢夫斯塔恩格爲一個惡魔似的鋼琴師。我在皇家別墅旅館（The Kaiserhof）聽過他的彈琴。那反響的聲音大極了，以致四週的牆壁都震動。當漢夫斯塔恩格奏琴的時候，他鼓起他的雙頰，與他自己彈的音樂合拍，咆哮起來有如喇叭聲一樣。結果是可驚人的。你不得不相信一個吹喇叭的人是藏於房室之內。但希特勒現在對於漢夫斯塔恩格的寵幸，人們相信在遞減了。

希特勒不大注意書本，不大注意他的衣服（他除穿上一身普通褐衫制服，或一套雙排扣的藍色嗶嘰衣服，和一件不可省的雨衣，及一頂邊垂下的帽子外，不穿其他東西，）一點不注意他的友人，一點不注意他的食物和飲料。他不大抽煙，也不喝酒，他不許任何人靠近他抽煙。他實際上是一個吃素者。在慕索里尼請他的筵席上，他只吃了兩份的煮蛋。他有時喝咖啡，但並不常喝。每星期他由總理公署到皇家別墅旅館一次或兩次。（皇家別墅旅館爲在國社黨未執權以前的大本營，）坐在那裏吃巧格力。

這樣於是使得許多人說希特勒是奉行『制慾主義』，但是『制慾主義』不是一個

很適當的字。他的興趣限於美術方面，但他既不是一個熱心宗教的人，亦不是一個隱士。希特勒的內心中是很少嚴肅性的。他只吃蔬菜——但是他的蔬菜是由一個特別能幹廚房頭子預備的。

當他在柏林的時候，他總是在威廉斯薩（Wilhelmstrasse）的總理宮（Palace of the Reichskanzler）工作。他很少用同在那條街上只距一百碼的總統府，因為當興登堡逝世的時候，他即要竭力減少人們對於總統制的德國的記憶。總統府是新建築的，有近代的玻璃和材料，希特勒會幫忙設計。牆上飾以武騰（Wotan）神的生活刻像。靠街的一面造了一個臨時的洋臺，從那洋臺上，在有集會之類的事的時候，領袖可以檢閱他的部下。據說在大廳的下面，有一個安適的防炸彈的地窖。

希特勒不歡喜柏林。他有機會總願離開這德國的首都，歡喜慕尼克，或伯契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後者為巴威南部的一個鄉村，他在那裏有一座阿爾帕斯山式的小屋，屋名叫鄉居廬（Haus Wachenfeld）。那別墅立於山邊，是他所愛好的，離奧國邊界不

遠，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心理事實。從他的前面走廊，他能見到他的家鄉，他是被他的家鄉遺棄的，而他是思念着他的家鄉呵。

### 三

觀察一個人的朋友，便可以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人。但是希特勒沒有一個朋友。好幾年中他的最親近的同事爲魯姆上尉，S A ( Sturm Abteilung 挺進隊，褐衫軍人 )的首領，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爲希特勒所殺。從德國六個最熟悉情形的人之一，我聽說魯姆是六千五百萬德國人中，希特勒對他隨意談話僅有的一人。現在魯姆死去，沒有一個人叫希特勒爲『阿多夫』了。魯姆是一個著名的同性愛的；但是人不能從這個事實而推論到希特勒也是同性愛主義者。

現在最接近希特勒的是伯魯克涅副官 ( Lieutenant Brückner )，他的衛隊長。僅有兩個人能够用不着事先接洽，隨時地見到他，這兩個人就是他的外交顧問里本多布

(Ribbentrop) 和經濟獨裁者沙赫特 (Schacht) 他的主要的永久官員，如他的新聞秘書第屈德 (Dietrich)，每天可以見到他，國社黨的代理領袖奚斯 (Hess) 也可以這樣的；但甚至奚斯都不是他的『親密』友人。沒有事先接洽，即戈林 (Goering) 或哥培爾 (Goebbels) 都不能見到他。

他差不多忘記了他普通的私人交際。在一九三二年選舉運動的時候，我的一位同事二個月中每天和他同坐一隻飛機。在天空的長時間中，他總沒有和一個人談話，甚至他的秘書們他都不睬；他總是移動都不移動，笑都不笑。我的朋友很能記得明白，當飛機停下來，他要抽煙的時候，他跑開避免四圍的人，他說他在旅行期間，每天見到希特勒有五六小時之久，但是他很確信，如果在飛機以外，希特勒偶然遇見他，決不知道他的名字或面孔的。

希特勒常使得他的屬員不與他接近。他們崇拜他，但他們不十分認識他。他們也許每天，一年到頭，看見他；但他們決不敢和他親近。漢夫斯塔恩格某次告訴我他與希特勒好多年來的關係，除了叫他『希特勒先生』 (Herr Hitler)，或在這位領袖執政之後，叫他『



總理先生』(Herr Reichskangler)以外，不叫他別的；而希特勒也沒有叫過他的第一個名字或他的小名(普子 Putzi)，總是叫他『漢夫斯塔恩格』或『漢夫斯塔恩格博士』。

一個老國社黨員現在要稱希特勒爲『我的領袖』(Mein Führer)；其餘的人稱他爲『總理先生』。當黨員對他行黨禮，並說出『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的時候，他自己也回答『希特勒萬歲』。演講時這位領袖稱他的黨徒們爲『我的』德國人民。在公民投票的標語上，他問：『德國的男子，你盡了責任嗎？德國的女人，你盡了責任嗎？……等等。』好像他覺得對於德國全人民比對於任何德國個人要接近些，而這也是很的確的。德國人民是他的人生之主要的情感表現的對象。

現在讓我們研究希特勒對於人生需要物件的關係，這些需要物件是支配着大多人的生活的。

從個人的性的觀點上說，他對於女人是完全沒有興趣的。他所想到的女人是主婦與

母親，或能幹的母親，預備兒子爲戰場之用——他所想的是他人之子。

他在他的自傳『余之奮鬪』（*Mein Kampf*）中說：『我們人民的生活必定要免去近代色慾主義中的使人氣絕的脂粉氣。』他的私人生活完全是照這句箴言做的。他不是一個恨女子的人，但他避免女子，避免與她們見面。他的態度是一個謹慎武士的態度，慣於吻手——此外便沒有了。許多女子在性的方面很能引動他的，但是不能夠追求他。哥培爾夫人（*Fran Goebbels*）從前開夜會，常請美貌而顯貴的女子與他見面，但是她做不成媒人。有一時有一種謠言，稱這位含羞的領袖與瓦格涅的孫女訂婚。這是無稽之談。希特勒一生也許還沒有與女子發生過關係，這是很可能的。

許多人相信他是同性愛主義者，也是不對的。幾個德國新聞記者曾費了許多時間與精力偵察這回事，希特勒在慕尼克所住過的旅館，他們都核對過；他們訪問酒館的主人，咖啡館的招待，女房東，門房。但找不到證據說希特勒在任何時間曾與任何男女親密。他的性的能力，在他事業之始，便用在演說方面了。

希特勒個人不用錢，所以除了因錢作政治的目的外，對於錢是沒有興趣的。他的財政知識並不豐富的。

現在，他要錢有什麼用處呢？國家供給他的僕人，住宅，汽車。他最近私人自購的物件之一為一件新雨衣，為拜訪慕索里尼之用，這會面是一九三四年六月間的事。因為偶然的原故他的屬員因為這事而大為不安，因為他們勸希特勒穿普通衣服；但是當他從飛機裏走出來的時候，他見到慕索里尼和一般意大利人都穿上制服，他因之而深感慚愧，甚至懷疑他的顧問們有意使他受窘。

希特勒不拿國家的薪水；他將他的薪水捐贈於一筆贍養工人款項之內，該款是為工人工作時遭意外之禍而用的；但是如果他肯節省的話，他的私有財富是很可觀的。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中，他宣稱他是政治家，沒有銀行存款，沒有股票的僅有的一人，在他作那句話之前，大家想他是慕尼克弗蘭茲公司 (Franz Eher & Co.) 的股東，弗蘭茲公司為國社黨的主要宣傳機關，發行國民觀察報 (Völkischer Beobachter) 進攻報 (Angriff)

等等，係歐洲最大的印刷機關之一。該公司理事馬斯·愛曼（Max Amman）為歐戰期中希特勒的最高侍衛，後來任他的商業經理多年。

如果希特勒沒有私財的話，他一定是將他所有從他的自傳『余之奮鬪』得到的收入，放在國社黨中用了。這本書幾乎是德國人必讀的書，價格很高（七·二〇馬克，二·八八金元），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已售出一，九三〇，〇〇〇本了。少說一點，以百分之十五的版稅而論，希特勒從這本書的所得，至一九三五年冬為止，應該有八十萬金元。

在歐洲沒有一件事較考查要人的私有財產更難。在任何國家，考問的人是得不到真實的消息。是不是一個獨裁者，無論其為希特勒，或慕索里尼，或斯達林，放錢在他的衣袋裏，或用錢親自購買東西呢？不見得吧。

## 四

他生下來是一個天主教徒，也被教養為天主教徒。但他在少年時便失去信仰，不參加

任何宗教的禮拜。他的天主教對於他是一點沒有意義的，他不要宗教的慰藉。他組織政府的時候，馬上即對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猶太教徒作宗教戰爭。

爲什麼緣故呢？這個原因主要地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希特勒認爲國社黨革命的第一件事件爲德國的『統一』——調和。他有一種迫切的熱情，以排去帝國內的任何競爭。天主教和猶太教一樣，是一種國際的（因之而非德國的）機構。所以要打倒牠。

希特勒主義的基礎爲他的一種願望，求掃清德國的非德國份子，他想建立一個百分之百德國人的百分之百的德國。他不歡喜銀行家與百貨公司——如湯布森（Dorothy Thompson）所指出來的——因爲他們與牠們代表非德國的，國際的，金融的，與商業的勢力。他恨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因爲他們屬於世界集團，以使勞工國際化爲目的。他最討厭和平主義者，因爲和平主義者反對戰爭，基本上是國際主義者。

他認爲天主教是一個特別危險的競爭勢力，因爲天主教要求一個人雙重忠心，而雙重忠心不是希特勒所能允可的。於是發生驅逐『黑老鼠』的運動，國社黨員稱教士爲『

黑老鼠。』於是有攻擊慕尼黑主教佛哈伯 (Faulhaber) 的事件；羅森堡 (Rosenberg) 及哥培爾的反天主教論辯；一九三五年八月的迫害事件。

新教在理論上是希特勒能易於應付的簡單事件，因為路德教會被假定為德國的與國家主義的。希特勒想僅使那軍中牧師，兇猛的國社黨員穆勒 (Mueller) 為帝國主教，他便能調和德國的福音教堂，使牠為他所利用。統一新教教堂的觀念，在他的那伶俐的建築師腦中盤桓着。他錯誤了。教會問題自來即是一件麻煩的事。

使新教國社黨失敗後，有些希特勒的黨徒，自然轉向異教主義。古代斯干的那維亞的神話成爲一種頭等的國家主義替代物。國社主義到了牠的極端，那是要求建立一種新而合乎國家主義的宗教。

海登 (Heiden) 曾引用希特勒的話：『除了德國本身以外，我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上帝。』這是一點。德國成爲希特勒的宗教。

在『余之奮鬥』中，希特勒生動地敘述他第一次遇着一個猶太人的故事。他那時是

十七歲，一個人在維也納，沒有看見過猶太人。這個猶太人是從波蘭或烏克蘭(Ukraine)來的，穿上猶太衣服，使年青的希特勒大為不快。

『這個人就是猶太人嗎？』他問他自己。他接着又問第二個問題：『他有做德國人的可能嗎？』

這個初期經驗對於他有一個深大的影響，爲他熱切反閃族主義(Antisemitism)的情感基礎。那樣一個人可以做和他一樣的人，享受條頓國籍，這從他的偏狹之見看來是一種侮辱。後來他根據經濟與政治的立場而使其憤怒『合理化』。他說：猶太人奪去『德國人』的職業；猶太人控制柏林的報界、戲院、藝術界；猶太律師、醫生、教授太多了；猶太人是一種『瘟疫，較黑死病還厲害。』

沒有細心閱讀『余之奮鬥』的人，不能正確地認識希特勒反閃族主義的澈底基礎。那本書是十年前寫的。後來每版他都有小小的修正，他不許毫不刪改而在外國出版。最近他控告一個法國發行人，因爲後者想發行一本不縮短的譯本。而在各版中，他深深反對猶

太人的成見總存在着。

除那本書敘述的以外，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事件。譬如說，一九三四至三五年的冬季，他去看那叫做“Tovarish”的戲劇有四次之多，那戲劇對於俄國亡命貴族的苦境表示同情，而譏笑布爾斯維克黨人。在他第一次去看戲之前，據說他的祕書打電報到巴黎，詢問該劇作者第伐爾（Jacques Deval）的祖先是不是雅利安人。如果希特勒去看有一部份猶太血統的作家的戲劇，那成爲奇事呵。

遠在他未任總理之前，他不對一個猶太人說話，甚至電話中說話他都不肯的。政論家著名如李卜曼（Walter Lippmann），政治家顯要如黎定爵士（Lord Reading），都不能在褐宮（Brown House）受到接待。一個有趣問題發生了。希特勒自少年以來，真正沒有和一個猶太人做過伴侶，或和一個猶太人說過一次話嗎？也許是沒有吧。

## 五



現在我們可以對於希特勒的良好方面的性格，作一概述。

先談他的堅定意志，他的集中一個目的。他的策略也許改變；他的戰術也許改變；而他的目的是永遠不移的。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合乎民族主義的德國，而他居於這國家之上。他的方法可以變動的；而他的目的始終如一。

與他的堅定意志相聯的爲他的精力。一切獨裁者都有精力；他們都需要精力。雖然希特勒欠缺有力的姿勢。

但是他的身體的持久力量是很大的。我認識許多訪問他的人們，他們在選舉舉行的前夜和他談話，這時他一星期來每天在德國各處作好幾次的演講，而他的精神健好，甚至若無其事的神氣。他說：『我有一個使命要完成的時候，我總有力量完成牠。』

如一切獨裁者一樣，他很有能力應付困難的工作，雖然他不是一匹拼命工作的馬，如斯達林一樣。但是他做了許多工作。一個國家的獨裁者或元首的『勞力』普通係指閱與聽的能力。希特勒與慕索里尼工作的大部仍爲閱讀報告，和注意聽着專家和僚屬的忠言。

他們工作時間的一半是容納消息。所以一個獨裁者需要（甲）善於用人（許多希特勒手下最能幹的人，爲舊文官制度下的人物），（乙）將他自己的信心灌輸於他們。這兩種工作希特勒都很成功。

希特勒政治意識發展得很高，而且也很敏銳。他的計謀是周密的，無微不至。譬如說，他對外交政策的幾個重要決定——德國退出國聯和重整軍備——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從容地宣佈的，使得外國的輿論不致震動。當他有不快樂的事件需要解釋時，如六卅事件，他總是在下午八時說話，所以外國報紙只能急急地記下他的話，或者對於他的話加以竄改。

他很可能實際上利用他的反閃族主義。猶太恐怖實爲一個很好的選舉運動的策略。一九三三年三月國社黨的執政，是因爲作了許多不可靠的選舉時的誓言。該黨承認消滅失業，廢除凡爾賽條約，恢復波蘭走廊，同化奧國，取消百貨商店，工業社會化，廢去資本的息金，給予人民以土地。這些目的是易言而難達到的。而有一件事國社黨能做得得到，一個誓言他

們能夠實行——毆打猶太人。

希特勒以直覺來決定大多事件。這種辦法在兩個緊要關頭都很好。一九三二年的春季，他的許多最有勢力的擁護者，主要的爲魯姆，迫他舉行一個暴動，希特勒拒絕了，他絕對地感覺得他可以以合法方式取得政權。後來在一九三二年的秋季，在十一月選舉中國社黨大損失後，該黨一部份有勢力的派，由斯特薩領導，要他承認失敗，在不利的條件下參加聯立政府，而希特勒根據他完美的聰明加以拒絕。但在三個月之內他握了政權，即他的黨人中的最瘋狂者亦沒有夢到。

希特勒權力的另一來源爲他的沒有私人關係的性格，這我已經敘及。他的虛榮心到了極端，但很奇怪，他的虛榮心不是他私人的。他沒有傲然誇耀的神氣。慕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以來，一定贈予了數千他的傾慕者以手筆和照片。而希特勒所贈予他的友人的爲雙手的手指。他的虛榮心以非私人的方式表現出來，更顯得有效力。他是德國人民意志的工具；或者他假裝這樣。所以在六月三十日的暗殺案之後，他有一句名言，即二十四小時中他

做了德國的最高法院。

希特勒是一個情感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他的『智力』是一隻變色龍（動物，蜥蜴類，——譯者）的智力，知道應時變色，是一匹蟹的智力，知道何時要潛入泥沙；他的『邏輯』是一隻豹的邏輯，餓了便尋找食物。

他的頭腦是充滿着情感，我們很容易看出來。他興趣的範圍是很小的，以致任何的刺激發生同樣的反應：音樂，宗教，經濟學，對於他都沒有意義，除非施用於國家主義。

英國外交家艾登（Anthony Eden）於一九三五年春作柏林之遊，及與希特勒談七小時之後，稱希特勒對於外交事件『完全精通』。而實際上講起來，希特勒所懂得的外交事件，不及克涅克布克（H. R. Knickerbocker）或巴雷特（Vernon Bartlett）或西蒙（Frank H. Simonds）或阿姆斯東（H. F. Armstrong）或艾登自己所知道者的十分之一。

## 六

再是他的口才。這也許是希特勒得居高位的主要解釋。他由於說話而握到政權。而奇怪的是希特勒爲一個不好的演說家。他尖聲叫喊；他的演說姿勢並不十分好，在每段話說完時他的聲音便低下去了；他向來不知道說話到什麼時候要停止的。哥培爾是一個較高的演說家。然而希特勒的吸引力雖然差不多不能吸引桌對面的人，而能感動一羣聽衆，一大羣的聽衆，使他們發狂。

他自然知道一切的騙術。在某一個時期他常盡量地說「我們德國人」有的是什麼，沒有的是什麼，要做的是什麼，不能做的是什麼。「我們德國人」這字引聽衆入狂。講到這裏希特勒意外動人地停止了。他以後再說：那是整個的病症呵。在德國「我們德國人」這字沒有意義了；國家是分裂的；「我們」沒有了。

最近希特勒告訴一個法國訪問者他的一個少年時演說的惡作劇與勝利，這是十五

年前在巴威的一個共產黨堡壘的事，他被嚴酷地責難。『在那個時候，他們也許將我擲出窗外，尤其是當他們拿出一個大戰中瞎了眼的人來說話，反對我認為神聖的東西，那樣做是很可能的，幸而因大戰的結果，我也會瞎了。所以我對那人說，「我知道此人所感覺的是什麼。有一個時期我比他還要昏亂哩，但我已經恢復我的視覺了！」』

希特勒的最初羽黨是真正的放棄其他信仰而信仰他的。他們以他的話為是。希特勒也許做了麥克·斐孫（Aimee Semple McPherson）或聖德（Billy Sunday）一次聽過他說話的便終身是他的人了——如哥培爾，伯魯克涅，戈林，奚斯。

## 七

希特勒使用起恐怖來是毫不顧慮的，恐怖在建立國社黨國家中為一很有力的任務。自起始他便鼓勵恐怖。『余之奮鬥』中僅有的純粹快樂的一段為描寫他的第一次民衆大會，大會中新組織的挺進隊以刀擊向大會責難的人，使他們流血。挺進隊的功用為喧鬧。

第一，喧鬧以維持會場的『秩序』；第二，在街上喧鬧，以驚嚇、恐怖，及暗殺共產黨人。

他給予位置，高的位置，於自認的恐怖主義者和暗殺者，如克林格（Klinger）和海涅（Heines）。當在西利西亞（Silesia）的波特巴（Potempa）一個共產份子在極殘暴的形勢之下遭暗殺時，他公開地宣佈他精神上是與這般暗殺者相結合的。一九三二年八月他想與登堡會任他為內閣總理時，他請求三天讓挺進隊在街上自由行動，這樣向他們的敵人報復。我們是不能忘記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

希特勒對於政治思想的一個貢獻為領袖主義（Leader Principle），那簡單地說，便是威權由上而下，服從由下而上，將民主政治理論顛倒一下。如海登（Heiden）所指出的，這是一個特殊成功的發明，因為每個人都能參加這個運動，不問目的的如何不同，而因領袖的人格遂至精神上聯合起來。國社黨運動對於性情和願望不同的人都很能拉攏的。而德國人民也愛被統治。我的一個朋友在柏林說：『一個德國人所能經驗到最幸福的事件，就是被管理。』毛理爾（Edgar Ansel Mower）曾記下少年國社黨人所叫的

口號：『我們睡棄自由。』一個德國人如果不穿上制服，就覺得好像沒有穿衣服一樣。領袖主義不僅利用這感覺使得這種德國人順從的被動性成爲一種自動的美德；牠也表示順從有雙種性質，就是說大多的人類——甚至德國人——總是將被治的願望與隱藏着的治人志願聯繫在一起的。領袖主義造成了數千百的小領袖，一直到最低的挺進隊領袖。這種主義將莊重的順服和領袖機會聯起來了。

『余之奮鬪』雖然敘述希特勒沒有個人關係，而他一再表示他對於『領袖』的信心。在種族與國家之後，他的最主要的成見便是人性。我們很容易看出來領袖主義不過是他自己野心的合理化；他所以宣佈領袖主義，因爲有這個默認：領袖就是希特勒自己。他說：『多數人決不能替代一個領袖。』

八

希特勒的衛隊長伯魯克涅副官有兩個助手，一個叫做士刺布（Schraub），另一個



叫做士勒克 (Schreck)。士刺布擔任一切希特勒的行的事件，準備汽車與飛機。(希特勒和林白上校 Colonel Lindbergh 一樣，實際上不乘火車了。)侍衛中還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是不知道的，而大家說他爲德國薪水最高的一人，依照倫敦的每日電報 (Daily Telegraph)，他的面貌爲希特勒第二，他是很像希特勒的，如果需要的話，在會場中能夠替代希特勒。

自然地，對於保護希特勒不遭暗算，是極其小心地佈置。人們想伯魯克涅，士刺布，和士勒克是訂有一個自殺公約的；不管他們如何的警備，但是如果領袖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件，他們便自殺。最近一位英國政客和希特勒在總理公署聚餐，因爲興奮的緣故，他碰倒一個大瓶。馬上武裝的黑衫警士 (S.S.)，從每個屏帳後面跳進來。

當希特勒在柏林出外的時候，他乘的是麥西得·比茲 (Mercedes-Benz) 牌汽車，有如火車頭那樣大。伯魯克涅普通總是坐在他的身邊。士刺布與士勒克乘另一部車，跟在後面，帶着來福鎗的黑衫警士可以立於車的板上。如果是在儀式的集會，而到的人們衆多

的話，路上由黑衫警士站崗，一個面向路的裏面，另一個則面向着路的外面地站着。

伯魯克涅在政治上所佔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可以阻礙希特勒的通常往來。我們常聽到這種怨言：甚至關於很重要的事情，希特勒都不大得到消息，因為伯魯克涅使他孤立而不與多人接觸；即最有誠意的顧問們也許沒有機會見到他。

不久以前，希特勒在社交方面破了他的常例，非正式地去看一位外交家及其夫人，他們在從前幫過他的忙的。這位外交家坦白地和希特勒談心，告訴他一些誠實話。希特勒煩惱起來了。據說伯魯克涅於是攻擊這外交家，警告他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再和希特勒坦白地談話。

到一九三五年之末為止，關於謀刺希特勒的企圖，是沒有可靠的證據的。而謀刺的謠言則有二個。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六卅事件的前兩星期，當希特勒從戈林第一個夫人下葬德士回歸的時候，有人持鎗射擊他的汽車。一九三四年秋，一個黑衣警衛在皇家別墅旅館手指中鎗，那子彈本來是射希特勒的。

在倫敦有希特勒人壽險費的估計。在德國擔任重要工作的希特勒，如果被刺，很可能以發生恐怖與革命，國家因之而傾覆的，他保每一千金元的保險，每月付五二·五〇金元。

## 九

至一九三五年之末為止，希特勒已舉行過兩次公民投票。一次是叫人民擁護他退出國聯，他得到百分之九二·三的信任票。另一次是在奧登堡逝世之後，求內閣總統和大總統的職位合而為一，全投票人的數目為四三，五二九，七一〇，贊成的為三八，三六二，七六〇票。自然如果以盎格羅薩克森（Anglo-Saxon）的術語來說，這兩次投票沒有一次是公平的。

最後一次德國合理的公平選舉，即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所舉行的，雖然國會中已有國社會的火影了，而希特勒所得的票只有百分之三十七。我相信假使現在舉行選舉，他所得票數一定要多多了。然而即在國社黨氣焰甚高的時候，一九三三年馬克斯主義者（

共產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者，尚有一一，八四五，〇〇〇票。現在這個數目也許退落了，然而德國的暫不擡頭的政府敵對黨，仍是不在少數。這幾百萬隱藏起來的選民，遇着了什麼呢？

他們遇着恐怖。他們有警察與偵探跟着。在公民選舉的時候，他們投『贊成』票，因色彩的關係他們受到威脅。有些因避免色彩之故，參加了挺進隊。而大多的人們則將他們的意見，情緒，和良心暫且吞下，以等待着。他們等待他們日子的來到。但是他們是一種活動的政治力量嗎？不見得的。

原因是這樣的：在警察滿佈的國家，如德，俄，或法西治下的意大利，革命是深感困難的事件。革命是不會成功的，除非等到革命黨人的軍火設備與政府的相等，或勝過政府；這已差不多成了今日的一個原理了。而軍火上欲求勝過的話，是很不容易達到的。

國社黨人因一九三五年七月的奧國內戰，發見了軍火的絕對需要，這次因缺少軍火而於他們不利。他們由於不當心或信心過甚，沒有把他們的奧國同志武裝起來；他們以爲

叛變的命令一下，奧國兵士和警察就會兵變，附和國社黨人；而事實並沒有這樣。陶爾斐斯博士（Dr. Dollfus）的兵士和警察全體都是忠心的。所以千萬有潛勢力的革命的國社黨人，因為沒有軍火，被禁而不得作何果斷的或直接的動作。這個教訓是重要的。你不能用『蹦』的一聲來抵抗機關鎗。

如果人民叛變，希特勒用鎗征平他們好了。他有常備軍（Reichswehr），擔任這種工作不僅有挺進隊和黑衣警察。常備軍（大多為農村男少年）也許對於農村中發生叛變不肯放鎗；但是農民在希特勒的帝國中是最馴良的。市民反叛則立時處決好了。但是有人會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甚至希特勒，能夠鎗殺若干萬沒有武裝而略帶武裝的叛民的。對於這句話的回答是，鎗殺若干萬的人是不需要的，只要鎗殺幾百人便夠了。

較公開反叛的可能性來得大一點的是民衆不滿的漸漸增高怨聲載道，和消極抵抗，因貧苦生活不安定而發生怠工，一直到政府難於維持。政府恐慌便會做出愚笨的事來的。不滿意也會漸漸達到上面，國家的領袖職權分散，使得主要領袖以外的副領袖們間發生

新的對立，譬如說，哥培爾與沙赫特分裂，裂縫深而不可彌補，以致希特勒無力調和這個衝突。

到了這個時候，政府也許企圖一個老而危險的不正當事件——戰爭——了。

假使希特勒明天死了，他的最有可能性的繼承者爲戈林，雖然他爲許多國社黨人所不喜和畏懼。希特勒也許願意他的代辦奚斯爲他的繼承者，但是在這個他死後的緊急時期，奚斯很少有機會與那剛猛的戈林爭奪。這位將軍是一定被選的。這是一個令人恐怖的可能性。

戈林是有力量，外貌，和野心的；他是一個拿得住羣衆的人。他的制服的質與量都很能引動德國人；他的結婚也許產生一個王朝。尤其重要的事是軍隊歡喜他，因爲他能够代表軍隊所代表的一個強大的德國。而且戈林有挺進隊與剩餘的黑衫警士做他武力的後盾。最後他有其他方法奪取這個位置，如果需要奪取的話。

哥培爾不能做希特勒的繼承人；他是那羣人中的最聰明者，但是每個人恨他。佛里克

(Frick) 是一個要角；但是太無生氣了；奚斯則太沒有野心；萊氏 (Ley) 與 達利 (Darre) 以『激進者』著稱，無取勝之望；沙赫特在經濟與財政方面極其重要，但不能做一個衆望所歸的領袖。實際上除了戈林之外，其他辦法只有軍人實行政變，組織一個軍人內閣，如斯轍萊 (Schleicher) 或其他意外的人來擔任首揆。

現在有許多謠言，稱戈林正在積極進行圖謀反對希特勒，這是無稽之談。戈林固然缺少許多美德，但是忠心並不是這些缺少的美德中之一——至少暫時還沒有缺少。而且，希特勒現在能夠很容易地革除戈林，差不多如同他對魯姆一樣。希特勒的勢力大極了。真正的政敵尙未存在。戈林，哥培爾，及其餘一切的人，如克涅克波克 (H. R. Rnicherböcker) 所說，不過是希特勒這太陽的月星罷了。這些月星只是當太陽光照着牠們時才能發出光來呵。

## 第三章 斯達林

『領袖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個做領袖的人不能落在一個運動以後，因為落後了便離民衆而孤立。但他也不可衝在前面，因為衝在前面會失去對民衆的接觸。凡是一個想領導一個運動的人，必須要雙管齊下，——一方面與落後的人們奮鬥，一方面與衝在前面的人們奮鬥。』——斯達林

『革命不是帶上絲手套可以成功的。』——斯達林

—

斯達林 (Stalin) 是現在世界上唯一的最有勢力的人，也是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與其他的獨裁者不同，因為他不僅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絕對領袖，而且是一個運動，即共產國際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絕對領袖，共產國際在各國都有基礎的。他與希特



勒和慕索里尼還有一點不同，就是他爲第二代的獨裁者，他的權威是由他的前人列寧（Lenin）那裏得來的。

他的獨裁職位並不是列寧委任的，實際上正相反。列寧是不願斯達林做他的繼承人的，關於這一點列寧的意見很顯明。聽着吧。

『斯達林同志太粗魯了……我向諸位同志們建議設法免去他那個位置（共產黨的書記長，）而另行委任一個人，這個人要樣樣都比斯達林好，——較有忍耐性，較忠心，較有禮貌，對同志們較關心，較不反覆無常，等等……』

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而十一年以後，斯達林受他的屬員讚美的名詞，幾乎是列寧所理想的人物那樣的好。在蘇維埃的報章上，他總是稱爲『偉大者』、『親愛者』、『勇敢者』、『聰明者』、『感人者』、『天才者』。城市以他的名字爲名的，有四個之多；斯達林格勒（Stalingrad），斯達林納巴（Stalinabad），斯達林諾哥斯克（Stalinogorsk），斯達林斯克（Stalinsk）。慶祝會散會時，往往總是叫這個口號：『我們親愛的領袖，我們熱誠愛戴的斯』

達林，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朋友萬歲。」

讓我們對於斯達林權力的來源，作一清算吧。

第一，他有勇往直前的膽量，耐久的能力，強健的體格。他有心臟擴大的毛病，否則他的體力和耐久能力是更大了。他不是一個大神經病者，如希特勒一樣，他的體力也不與他的情感密切地聯繫起來，如慕索里尼一樣。斯達林的情感有如巖石上的石板一般。假使他有神經的話，他的神經是石頭中的石脈。

他又有忍耐性，記憶力，注意力。他的堅耐的精神，如杜蘭特（Duranty）說是『人類所不能的』。他是一個性慢的造磚者，他的慢的程度常使他的黨人焦急起來，因為他們看出他正在造的房屋的輪廓。他的路線是不移的，不過他望得『遠一點』。他的專注能力非常地大。如費斯撒（Louis Fischer）告訴我下列的小故事：

在莫斯科波爾索戲院（Bolshoi Theater）慶祝高爾基（Maxim Gorki）文學事業四十週年的時候，人們看到斯達林立在台上，與一個次等的共產黨人談得很起勁，那人

也許是一個省代表，然沒有人認識他。與其他的顯要職位的人比較起來，這個青年是並不重要的，但他問了斯達林許多問題。斯達林不注意會的進行，聽着這青年人的話，再慢慢地，娓娓動人地回答，絕對不知道他四週做的是什麼。

斯達林是狡猾的。他自然是個東方人；他自己也承認。他對他第一個接待的訪問者，一個日本人說：『歡迎，我也是一個亞洲人呵。』

斯達林從前竭力禁止毀壞他名譽的列寧遺言。但他沒有勢力這樣做。而近來散於蘇聯（U.S.S.R.）有五十萬張列寧和斯達林合拍的照片，他們倆坐在一條長凳上，以熱切的友誼態度談話。

斯達林首先對反對他的左傾份子托拉斯基（Trotsky），季諾維夫（Zinoviev）和卡明涅夫（Kamenev）作戰，後來對反對他的右傾份子布哈林（Bukharin），拉狄克（Radik）和托姆斯基（Tomsky）作戰，他都勝利了。這個勝利不僅是由於那無情的忍耐，而且由於富於想像力的狡猾和詭計。

當他需要爽直以達到他的目的時，沒有人較他還要爽直。他有自認錯誤的勇氣，這點很少的獨裁者敢做到的。在他的一篇文章『成功的昏迷』裏，他十分坦白承認農民的集合化進行得太快了。他在列寧主義 (Leninism) 裏寫着：

最重要的事爲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和在最短期間改正錯誤的勇氣。因醉於最近的成功而畏懼承認自己的錯誤，畏懼自我批評，不迅速地和毅然決然地改正錯誤——這便是大的困難之所在呵。

列寧主義這本書是自來所有的政治哲學釋義書中的最坦白的，——雖然冗長了一點。在那八百二十五面中，你可看到很多關於蘇聯的事情——好的，壞的，不相干的——的記載。斯達林注重好的事情，這是自然的，但他沒有隱藏壞的事情。在一九三五年未完結之前，這書已售去二百萬本以上了。

他有很大的細心。他的小心的眼睛能夠見到國家生活中的最小要素，普通他求小心的程度，希特勒或慕索里尼做夢也沒有想到要這樣做。譬如說，希特勒不閱看他的任何宣

傳郵件，即最有激發性的宣傳品的樣本他也不閱看。而斯達林樣樣東西都閱看，一直看完真理報（Pravda）的最後一段。他早晨開始閱看各地方報告，這些報告係從蘇聯各埠報告中細心地選擇出來的。張伯倫（W. H. Chamberlin）自然不是一個抱着友誼態度的批評家，而他說斯達林以私人干涉的方法，改正了許多不公平的事件，這些事件與他的通常職務是很不相干的。

一九三三年之夏，斯達林想知道麥格涅托哥斯克（Magnitogorsk）的建築，麥格涅托哥斯克為在西伯利亞所建設的工業城，報紙上大為之鼓吹。他記到伊維斯夏（Izvestia）的一個名叫加力（Garry）的特種新聞記者，便問人關於他的消息。這人在集中營裏找到斯達林將他釋放，派他到麥格涅托哥斯克去寫那裏的新聞。

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共產黨會議的時候，斯達林小心聽着他的第一個助手迦根諾維契（Kaganovitch）的演說。迦根諾維契正在講起某種不滿意的課本。斯達林插嘴說：「不是那種課本，而是那些活葉課本。」

當他的朋友基羅夫 (Kirov) 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列寧格勒被刺的時候，斯達林到列寧格勒去，要親自審問兇手。

他的另一權力的來源爲他的駕御人的本領。他是一個完善的政治戰略家，黨魁，和組織者。一九三五年夏，朋友們在莫斯科告訴我斯達林有『原形質的外層』(Ectoplasm)，他一走進一個房間，你便覺得他的觸角 (Antennae) 了。他個人的直覺力，和他的政治直覺力一樣，是很大的。他得罪了許多人；許多共產黨人否認他有人類關係的思想；然而他的部下忠心地爲他工作，他用人特別適當。

同志們崇拜希特勒，畏懼索里尼，恭敬斯達林；這似乎是重要的一點。

斯達林不是演說家。他的演講詞是簡單而有做買賣的神氣，很像一家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對董事會的報告一樣，但較長一點。他寫的字，當他捉到人的毛病濫用馬克斯辯證法的時候，特別是當他表示在意識基礎上與反對派意見相左的時候，是很粗的；他說話的聲音像一個不著名的大學中考哲學博士的學生一樣。他有被認爲馬克斯理論家的野心。

而如最近他對紅軍學校的畢業生演說，他避免哲學的問題，則成功得多了——直接，簡單，充滿着意義。普通他歡喜說明文中的問答方式。他的演說詞像教義問答書。而在風格方面，他的目的是在使大眾了解。

他的了解力是細細的，慢慢的，澈底的，不是銳利的，或敏捷的，但是看他和威爾斯（W. G. Wells）的談話，則他很能說話，以應付那位健談家。再看一九二七年他接見美國工人代表團。

在那個時候，他回答四小時的問題，各種不同而困難的問題。他完全是臨時談話，而他的话組織得非常地好，只有一個很有把握的人才能達到那個程度。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報告，約有一一，八〇〇字，蘇聯的一切目的都包括在內，這是向未曾有的最明白的報告了；除了有特殊智力的人以外，其他的人是做不到的。

當這個代表團於十分疲倦之餘，停止發問題了，斯達林問他們是否可以問關於美國的問題——他問了二小時以上。他的問題是深刻的，表示他很了解美國的情形；斯達林單

獨一個人，回答這代表團的問題，比較他們回答他的問題好多了。在這六小時的談話中，電話一次都沒有響；不許任何祕密插話——斯達林一有事情在手，便完全集中於這件事情，他的這個習慣，這裏又表現出來了。

斯達林的另一資產爲熱心。對於斯達林，共產主義是一種力量，他之信仰共產主義，正和教皇之信仰耶穌基督一樣。

他是異常地不講情面。如果我們否認這一點，那太愚笨了。俄國恐怖完全是向一個階級的進攻。蘇俄獨裁與其他獨裁不同之點，是在起始蘇俄即假定了有毀滅階級敵人的必要。在危機的時候，斯達林仍不惜以饑荒的武器來消滅反抗的農民。最後的分析告訴我們一切政府都是以武力來統治的。在蘇俄武力是直接地被採用，其目的是社會主義的，不僅使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俄國人蒙其利，而要使整個人類得到利益。從蘇維埃的觀點看來，這個目的是需要採取這個手段的。關於這一點斯達林是十分地坦白。愛斯多太太（Lady Astor）問他：『你繼續殺人，要到什麼時候爲止呢？』斯達林回答說：『到不需要的



時候爲止。』

一位離開蘇聯的蘇維埃聞人，被問他對於斯達林的意見。他回答說：『我看起來，斯達林太嗜殺了一點。』這樣不小心的話是很少的！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只有斯達林一人在俄國領土以內進行革命工作，這是有道理的。其他革命者逃亡海外，如列寧一樣，在圖書館與咖啡店過生活，直至一九一七年在那整個期間，斯達林是住在俄國。他做醜態的工作，他是『屋廳的打掃者。』因此他能多多認識一般不能露面的革命家，後來在需要的時候，能够使地下組織成爲他的黨的組織。

現在共產黨沒有主義問題的分裂了，如在托拉斯基的時代；現在沒有反對黨；斯達林絕對地爲黨的黨魁，黨的主人。黨的紀律是特別的嚴格；由斯達林管理的黨與國家合而爲一，而如費斯撒說，『黨機構的每個車輪和每個螺絲釘都由斯達林管理。』

斯達林造成了黨書記位置的重要，而並不是黨書記位置使得斯達林成爲重要，這讀者們要注意的。在斯達林以前，幾個人已做過黨書記。一個是波格達諾夫（Bogdanoff），

現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了；一個是克倫斯丁斯基（Krestinsky），現在爲外交部的一個官吏。只有斯達林能夠見到控制黨機關的好處；每個黨的位置都給予他的部下，給予他的地下工作時代的友人，這樣他的權力增大了。

我聽到這樣說：『列寧以智力和人格統治，斯達林以有效率的組織統治。』

斯達林的在黨內偵探術自然是最好的。有這樣一個故事：他使得某一個同志受着一種完全私人祕密性質的毛病的痛苦。斯達林會見他的時候，問候他說：『哈，你的……今天怎樣呢？』

我會說：他不是第一代的獨裁者，而是列寧的繼承人。他的策略是利用列寧做他的毆打敵人的棍子。在他對托拉斯基的長期鬭爭中，斯達林裝做並不是爲他個人的緣故，而僅是做『列寧的工具；』他始終責備托拉斯基爲『虛僞的列寧主義者，』那是俄國的最大罪惡，因此使得托拉斯基加倍地感覺困惱。引用經文以求達到某種目的的人，沒有一個有像斯達林引用列寧的話那樣好。慕索里尼與希特勒只能拿自己講話；斯達林則總有列寧

的有力的影子來作他的幫助。

這裏還可以注意另一點。蘇維埃的基礎力量要能對付蘇俄以外的世界，那是俄國的敵人。因此蘇維埃國家是獨立的，現在很能團結並且可以自給了。牠有完成的意識。馬克斯·列寧的教義，於是不致有分裂的可能性。斯達林自己代表這教義的可靠的言論，他不僅是俄國民衆的代言人，且是與那敵對世界對抗的俄人的代言人。

最後，如杜蘭特說，斯達林是不可少的。『領袖與主張已合而爲一了。』

## 二

斯達林不居政府的位置，除了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後，他曾任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三十七個委員之一。這常務委員會是所謂蘇維埃國會的基礎。理論上內閣（人民委員會）是向牠負責。但斯達林不是一個閣員——人民委員。

他現在不是共產黨的書記長了，僅是五個理論上平等的黨「書記」之一，其他爲迦

根諾維契，柴得諾夫（Zhadnov），厄諾夫（Ezhov），及安米耶夫（Andreyev）他是政治部（Politburo）最高黨機關——的十委員之一，這是用不着說的。

黨書記們和政治部的委員們，係來自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故這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原則上能够開除斯達林。在理論上他要遵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多數的議決案。而實際上他的被開除是不會有的，因為他控制執行委員會的選舉。

我曾說在蘇俄黨與國家是合而為一的；然而斯達林嚴格地維持黨職權與政府職權理論上的分開。列寧不僅是黨領袖，而且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首相。斯達林則拒絕了兼任這兩種職務。他歡喜做後台人物——黨魁。他統治着八百五十萬方哩的領土，較北美洲還要大，約大於歐洲二倍。

他的真名字是約瑟·維沙里阿諾維齊·茲賀加西維里（Yosip [Josef] Visarionovitch Dzhugashvili），一八七九年生於哥拉（Gora）附近於佐治亞省的提弗利司（Tiflis Georgia）城。傳說是這樣的：列寧給他一個綽號，叫他『斯達林』，這字俄文的

意思是『鋼』，稱贊他有鋼鐵的耐久性。實際上據一個匿名的同志說，這是一個「地下工作時代」的名字，一九一〇或一九一一年便有了，遠在列寧認識斯達林之前哩。

斯達林是一個皮匠之子，他的父親曾做過農民。他的家庭是很窮苦的，差不多與慕索尼尼的家庭一樣的苦，但是約瑟是得到教育的。從十五歲至十九歲的四年中，他在提弗利司的正教神學院（Orthodox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那學院最重要的當然是養成牧師人才。

他的父親和希特勒的父親一樣在粗俗的想像中，要他的兒子學父傳的職業。而斯達林的母親，也正和希特勒的母親一樣，一個非常的婦人，不要他做皮匠。她主張約瑟要進學校。大家都想斯達林因參加馬克斯活動而被正教神學院逐出。這是不對的。他讀了四年書之後，他的母親要他退學，因為貧困有害他的健康，不能再支持下去。

克涅克波克（H. R. Knickerbocker）曾訪問過這位斯達林的老佐治亞母親伊克特里納·茲賀多西維里（Ekaterina Dzhugashvili），她現在還是住在提弗利司，不

能說一句俄羅斯話。她稱『索索』(Soso)，她這樣叫斯達林，幼時這一個『很好的孩子』對於他這偉大成功她似乎是迷惑着了。數年前斯達林帶她曾到莫斯科。她在克姆林(Kremlin)衛城過了一個月，很不快樂，據稱她對於她兒子的顯要不能夠了解，因為她不能夠發現他倒底『做』什麼事賺飯吃。後來她便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回到提弗利司山中，以山中生活為滿足了。

佐治亞人不是俄羅斯人。甚至現在斯達林說俄羅斯話的時候，還夾着一點佐治亞的音調。佐治亞文字與俄羅斯文字之不同，不僅是英文與葡萄牙文之不同；兩種字母也不同的。佐治亞人為複雜高加索血統的南部人種；他們是山民，有邊疆居民的原始保衛天性；堅持與沈着的性情在他們面貌上很表現出來；他們的來源與亞美尼亞人(Armenians)很密切，但是他們有他們自己足以驕傲的民族歷史；他們有紫黑色的頭髮，和與夜午一樣黑的眼睛。

斯達林革命的動機第一來自貧窮，第二來自他在正教神學院的經驗。他恨由那狡猾

的，獨斷的教士所發來的權威，他們爲落後的地方教會，還加上褊狹的不容忍。在那正教神學院所過的幾年，對他的人生的成長時期無異地是重要的。他離開了正教神學院，遇到信奉馬克斯的朋友——於是他的長期的革命事業起始了。

自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七年的十九個不能公開活動的年頭中，他做不斷的，不可阻止的工作，永久致力於一個目的——革命；忍耐地，堅持地促成一個組織；受着痛苦，虐待，迫害，逮捕。希特勒與慕索里尼都看見過監獄的內部。但斯達林更是一個老資格的囚犯。他被沙皇的警察捕獲過五次，五次都被放逐。四次他僥倖逃亡；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使他從第五次的監禁恢復自由，那時他被關在北極圈之上，在土羅克汗斯克（Turkhanak）區域。

斯達林有助於實際的恐怖。黨需要錢，於是實行『沒收財產』政策，向銀行進攻，認爲銀行是十足的強盜。他任提弗利司黨部執行委員的時候，即一九〇七年，發生一個暴動，死者二十人，這事他要負一部份的責任；他的部下以炸彈投擊一隻運貨幣的船，劫去七千五百金元。這次死亡事件依照斯達林的上級黨人看起來是過火了一點，於是有一個時期——

——很短的時期——他被逐出黨外。

他利用時間——介乎判罪與放逐期間之中——做了許多比較溫和性質的活動。在裏海（Caspian Sea）西岸的巴庫（Baku），他編輯布爾什維克報紙 *Vremia*，用佐治亞文字。他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克拉科（Cracow）和布拉格（Prague）參加黨的會議；所以行蹤所至較其他的獨裁者為多。早在一九一二年他已在計畫寫一本書，叫做社會主義與國家問題。在那時候他是國會中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的領袖，同時還是黨報真理報的編者；一九一三年他又被捕，最後一次被放逐。

這一切都是預備。一九一七年實際生活才開始。革命一夜之間使他的機關——及千萬其他人的機關——從秘密結黨而成為正式組織，從叛亂舉動而成為公然統治。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政治部組織的時候，他便為其中委員之一；其他委員除列寧之外，為托拉斯基，卓諾維夫，卡明涅夫，索科爾涅科夫（Sokolnikov），勃布諾夫（Bubnov）。當政府成立的時候，他任兩個內閣位職：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和民族人民委員。



在內戰期間，他不及托拉斯基活動，雖然他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並且在烏克蘭（Ukraine）及後來在彼得格勒（Petrograd）對抗約第涅特齊（Yudenitch）他都有功。他擊敗一九二一年克羅斯達特（Kronstadt）叛變，為報答他這個功勞起見，列寧——一點沒有夢到斯達林會利用給予他的這個機會——任他為黨的書記長，由於這個位置他後來才握到大權。

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對各民族方面。他既不是一個俄羅斯人，這工作對於他最適配。蘇俄是一個至少一百個不同民族的混合場所，要做的工作便是將這些民族聯合起來成爲一個鞏固的集團，而同時讓各地方有自治之權，至少精神上要如此。斯達林在列寧指導之下，發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各共和國聯邦』的意思，這是一個便利的方法，由於這個方法，各『獨立的』與『自治的』共和國成爲蘇維埃『聯邦』，將中央權威交於莫斯科，而保留地方行政的特權。

斯達林自起始就妒忌托拉斯基，他們倆很早便發生衝突。杜蘭特記述這件事：斯達林

爲補救前線將士的不和起見，以沒有效率爲名槍斃了一羣軍官，而托拉斯基以最高軍事領袖的資格作電報抗議。斯達林在電報上塗了『不管』的字樣，便讓牠置於檔案中腐朽了。

那時期中另有一故事，表明他的不同的情緒。他在附近彼得格勒的地方閱軍。一個愠怒的兵士不肯行禮。斯達林問他，這兵士先指他自己的足，包紮着麻袋布，浸在雪與泥的裏面，再指斯達林的堅固的靴。不講一句話，斯達林脫去他的靴，將靴擲於這個兵士，堅持要用這兵士的溼而臭氣侵人的包布——繼續用牠，一直到列寧使他恢復普通老樣子。

杜蘭特說，斯達林之所以被列寧選爲他的繼承者之一，因爲他知道這個佐治亞人能够忍耐。那時候有句諺語說，『列寧信任斯達林；斯達林不信任任何人。』有的重要人物，斯赤夫爾（Paul Scheffer）也是一個，說列寧與斯達林在列寧逝世的四月以前，感情破裂了，因爲列寧不信任斯達林的野心，斯達林計謀取他的位置而代之。自然我們可以看到列寧在他的遺言中，表示不滿意斯達林性格的某幾方面。他說：『這個廚子要把食物做得太

熱了。」

列寧一死，這個佐治亞人便工作了。他與季諾維夫擡列寧的棺材。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斯達林化了五年功夫使他的組織底於完成，不稍姑息地肅清異端的敵人——他以責備他們背棄神聖的『黨的戰線』來攻擊他們，『黨的戰線』只有他一個人才能解釋——這樣使得他成爲蘇聯的絕對的獨裁。

### 三

斯達林否認他與托拉斯基的意見分歧是私人的緣因。然而私人的意見分歧是發生的。這兩位領袖很不能互相要好。他們來自不同的世界，甚至於馬克斯的橋梁也不能把他們連結起來。斯達林稱托拉斯基爲貴族和演員。至於托拉斯基在各方面實是一個貴族，除去他有了社會主義的意義，即便是說，他有頭腦，他有勇氣，及他有他的態度。托拉斯基稱斯達林爲一個鄉下人，奸詐，野蠻，腐化。

中產階級的和『平凡』的概念如私人仇恨，基於不合理的情感，竟在俄國革命史上成爲一個重要的因素，實是一件奇怪的事。但是事實確是如此——雖然私人的動機自然還加上其他的因素。托拉斯基恨斯達林之深，以致故意公開地侮辱他；譬如在委員會開會，斯達林演說的時候，他總是有意地拿起報紙，起始閱報。

他們倆性格的差別是很大的。斯達林爲一個熱切的政客，尤其是一個委員會中的人；托拉斯基爲一隻單獨的狼，一個猛烈的個人主義者，二十年來不能束縛他忠於黨中的布爾什維克派或孟什維克派。斯達林忍耐有如一張肖像，托拉斯基急切有如色情狂者。斯達林是不好動的，沈默的，謹慎的；托拉斯基是一個活潑的，坦白的，和習以爲常的健談家。斯達林實際上爲擲炸彈者；托拉斯基則不敢單獨暴動。斯達林爲一精明的，實際的暗中操縱者，不斷地顧慮着他的事業；托拉斯基爲一個歡喜抽象，情感，虛飾的人。斯達林爲一個最高等的組織者，托拉斯基爲一個有缺點的政客，不能妥協的人，很難同他工作。注意他們的笑吧。斯達林笑起來有如正吞下金絲雀的虎。托拉斯基是高興地自然地笑，如同一個孩子一

樣。注意他們的逃出西伯利亞吧。斯達林以無聲地、有效率地、從容不迫的冷靜態度走去；托拉斯基——一陣風！——到了天空；他逃去如同阿里爾（Ariel）一樣。

除了他們私人的衝突以外，還有極重要政治意見的不能調和。每個人對於蘇聯的設施有主要相反的理论。托拉斯基的『左翼反對黨』係來自『永久革命』的原則。他不相信，如同斯達林從前一樣，社會主義能够在一個單獨的國家成功。他相信只有在俄國以外發生永久的、繼續的革命，馬克斯制度在俄國才能够維持下去。

托拉斯基派見到列寧死後事情變做那個樣子，大為驚慌起來。他們想蘇聯的社會主義化進行得太慢了。他們恐怕列寧對資本勢力所作的策略的、暫時的讓步，即他所採取的新經濟政策（Nep, New Economic Policy）無限期地繼續下去；他們想共產主義在俄國本身所得的勝利之果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會要滅亡的。

斯達林採取相反的意見。他出力地說：『你們俄國以外的後輩們冷等二十年吧，我們將來對於你們總有辦法的。』托拉斯基說：『馬上與你們的俄國同志們聯合呵，以免去你

們的束縛。」斯達林說：「俄國先幹，當我們國家秩序建設好，再你們幹。」托拉斯基說：「你居住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國家便要先動手。」如斯達林所見到的，俄國漸入結婚生活後的平凡愛情。但是托拉斯基是一個本性難移的浪漫者，須要永久的革命，如同一個繼續不斷的蜜月。

斯達林當然是對的。五年計畫的很大成功已經證明這點了。一件事情過去以後而變做聰明是很容易的。七年以前，托拉斯基尚未被逐出俄國，五未計畫尚未開始，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定地預先見到這個結果。斯達林的預知之明，他的「遠見」是很值得欽佩的。

斯達林與托拉斯基及其友人分裂，所採取的方法，正是他後來用以破壞「右派反對黨」的方法（右派反對黨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化進行得太快了）。（一）他控制着黨部；（二）他對於列寧主義的解釋使得一切他的敵人成爲異端，因之他們須受處罰。（註）

【註】托拉斯基現在在被放逐中，組織了「第四國際」。奇怪得很，第四國際不知不覺地由中產階級的

美國出版人資助，托拉斯基大部份的經費是從那般美國出版人來的。

斯達林之怨恨托拉斯基，使得他採取很不光明的報復方法。但是說他刪去官方記載及課本中托拉斯基的名字，所以將來後代不知道他的名字，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在十月革命裏面，那是俄國到處可以購買得到的書，斯達林還是稱贊他的敵人，雖然不願意地，「讓我們承認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托拉斯基同志在十月期間，作戰很有成績。」

斯達林怨恨托拉斯基，而在這人類天性的複雜情形之下，斯達林叨教於托拉斯基者很多：他竊去托拉斯基一部份的政策。早在一九二一年，托拉斯基即鼓吹五年計畫方式的最高工業化，一九二五年他便去驅逐富農，那工作差不多在五年以後斯達林才致力的。但是病症即在此。托拉斯基性急，時機未熟，在一個不適當的時候，便主張要做這些事；斯達林則有等待的能力。

托拉斯基似乎決沒有認識當斯達林說他能在一個單獨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這個國家便是俄國，這完全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洲。托拉斯基也沒有想到將來為世界共產主義僅有最好的廣告是一個成功的，鞏固的，安全的俄國。

#### 四

自然俄國是有過一次饑荒。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夠否認這回事了。這是於一九三三年之春，發生於蘇聯最大的產穀區，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及烏克蘭（Ukraine）共產黨人在稍躊躇之後，現在承認這個事實了，雖然用婉轉的語術。

關於這饑荒的主要之點，我可說並不是死了幾百萬人民。張伯倫稱死亡者達五六百萬人之多。其他深明情形的人則相信這個估計過高。主要之點是蘇維埃政府致力於土地的社會化，以謀農民的利益；但是農民表示反抗，以致吃苦，這太不好了。爲妨礙政府起見，他們拒絕收穫穀類。因此他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吃而死。

饑荒的內面故事簡單地是這樣的。五年計畫包括農業的『集合化』。俄國完全是一個農業國家，一九二七年約有二千五百萬塊的農地，斯達林的計畫是要將牠們結合起來，成爲社會化的集合農場。農民要把器具和家畜交於一個農場管理人，而在比較大一點的



農地上共同工作，有國家供給的機關車以爲協助。那便是集合農場的意義。蘇聯社會主義的將來是倚賴着這個意義的。

而所發生的事是這樣的；農民深爲激怒，兩次大反抗那很有勢力的集合化程序。第一，他們宰殺他們的家畜，不願交於集合農場。這是一件反常與悲慘的事件——雖然不及後來人類受饑荒的悲慘。在農民中並沒有組織，並沒有聯絡；但是在數百個鄉村裏，相距數百哩路之遙，同時發生宰殺動物之舉。農民不願將他們的寶貴的牛羊及其他家畜交於集合農場的當局，自己結果了牠們。

這次的損失是可怕的。斯達林四年後承認了。蘇聯的農業經濟大受打擊，一直要到一九四〇年才能恢復；要到那個時候才能補足被殺的家畜。因爲屠殺一起始，直到蘇聯百分之五十的動物被殺才休止哩。

農民受了這次的災難，暫時昏迷過去了。政府——當遭了這極大的損失時——急急地後退。也許斯達林認識宰殺家畜可怕的程度時，已是太遲了。集合化的步驟是太快。依照

計畫，整個集合化只要十年；但是兩年之間，一九三〇年，一切農場的百分之六十五已經集合化。所以步驟慢下來。

即步驟和緩，而在一九三二農民堅持最後抗議無效後，又叛變起來。好像暗中約定一樣，另一個心靈的流行症傳播於高加索及烏克蘭的肥田區。集合農場以外的農民，是吃足苦頭的；他們或者買不到製造品，或者只是質料不同的製造品。他們便想到一個方法。他們種下穀類，長得很豐富的；但是他們決定不完全收穫。他們所收穫的正是他們計算他們冬天所需要的那麼多，讓其餘的去腐爛。『如果讓國家拿去，我們何必奴隸似地去求一個美好的收成呢？』

這當然是叛變。這不僅是對斯達林挑戰；這是以餓死來威脅他，使他屈服。蘇維埃政府需要穀物分配於工業區，即大城市；牠需要穀物輸出，以付五年計畫輸入的機器的款項。

即已經加入集合農場的農人，也讓他們在五穀腐爛。在集合農場是有幾個共產黨監督的，他們是有訓練的，忠心的農場管理人。消息傳到莫斯科，稱收成應該是很好的，大多是

損失了。斯達林認爲這是一個大危機。如果聽農民這樣鬧下去，革命要被打倒的。（『已廢的各階級不願意自然地消滅，』他告訴威爾斯。）他要幹，他幹了。

政府的收穀者到了農場裏來，他們漢子高大，有如莠草一樣高，將農民儲藏自用的一小部份的穀物取去！他們依次到每個農家，拿走納稅的積穀。如果一個普通的收穫是六十蒲式耳（Bushel，等於八加侖——譯者，）納稅也許是二十蒲式耳。而這農人只收入了二十五蒲式耳。所以當政府拿去二十蒲式耳時，他和他的家庭只有五蒲式耳——並非二十五蒲式耳——以過冬天與春天。

俄國經濟狀況仍是極端原始時代的。穀類問題，麪包問題，所以是生死問題。沒有穀物，人民便要死的。政府也許可以從城市分了一些穀物去養活農民，雖然那是一個每處饑餓之年。但是政府沒有那樣做。斯達林決定要讓農民嘗他們叛變的痛苦。他們既然盲目地，笨地拒絕藏穀，很好，讓他們餓死好了。於是他們餓死了。

同時，富農被用一個比較更直接的方法來清算。他們是有平均以上勞力，或能力，或財

富的農民；資本階級的農民，「農民前線的階級敵人」一九二八年在蘇聯有七五〇，〇〇〇人被官吏列爲富農。現在沒有富農了。他們像樹一樣被連根剷去，成羣地禁在獄中，送到遠處的勞働營，擔任強迫勞工建築鐵道，開墾運河。

饑荒破壞了蘇聯農民反抗的後盾。自饑荒以來，集合化是緩慢而順利地進行着。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約百分之二十五的土地被社會化。除了一小部最好的可耕土地以外，俄國一切的土地現在分爲二五〇，〇〇〇個農場。農民曾謀反叛。這反叛或許可以使蘇聯倒台的；但因斯達林的鐵一般的意志，這反叛崩潰了。農民殺死他們的動物，再他們殺死自己。

## 五

我們不要想斯達林是一個無識之徒。我們固然用不着假想他可以在佛哈大學擔任文學院教授；然而他的學識是博而深的，尤其是在哲學與歷史方面。人們自然地會以爲這

個沉默的佐治亞人是一個粗漢，一個有本能有氣力的人，而不是一個有頭腦的人。然而他的演說詞中引用柏拉圖，唐契阿德（Don Quixote），道第特（Daudet）；他知道一切關於代敦（Dayton）的猴案，魯意·喬治（Lloyd George）軟弱內閣的組織，以及美國工人的聯合；他與威爾斯（Wells）談話時，他表示對於克倫威爾（Cromwell）及憲章運動者（Chartists）的知識，勝於威爾斯一籌。

一九三三年他使得一個布爾什維克作家代表團大吃一驚，因為他告訴他們，他們的作品有許多廢話，這是由於他們對於普通教育沒有寬博的基礎。他說：『讀沙士比亞，歌德及其他古典文學吧，像我一樣。』

他的態度也不壞；他很少會客；但是遇見過他的人都稱讚他的樸素，他的恭敬地注意他們的問題，他的給予他們的方便。他的言詞中充滿着刺諷而莊重的口吻；如他稱資本家為『布爾喬亞先生們。』他限制他個人露面至最少的程度；在五年計畫的決定期間，他有十八個月不演說，不出席民衆會議。他是唯一的安靜的獨裁。

他有幽默的性情，雖然西歐人聽起來也許覺得難堪一點；他的幽默性情完全與希特勒和慕索里尼不同。蕭伯訥報告過他有喜劇的深刻意識。一九三〇年他對共產黨會議演說的時候，他拿布哈林與里可夫（Rykov）的右反對黨開玩笑，稱如果布哈林看見一隻蟑螂，他立刻會聞到災難，因為他先見到蘇聯在兩個月內要完結的。斯達林說：「里可夫擁護布哈林的關於這個題目的論文，然而這個保留：他與布哈林有一點大不相同，即是在他的意見，蘇維埃政府要滅亡的，但不是一個月，而是一個月零兩天。」

斯達林有時裝做謙虛的樣子。當威爾斯問他在做些什麼以改變世界，他客氣地回答說：「做得不多呵。」結束這一次的訪問，他說：「假使我們布爾什維克黨人聰明一點，一定可以多做了許多的事。」試想像慕索里尼或希特勒肯作這樣的自供嗎？

但是斯達林讓他自己被人供奉如神，並且鼓勵這回事。他的照片總是與列寧的照片放在一塊，享受列寧所有的榮譽。他的照片是給在莫斯科建築物的牆上，面對着行人，夜間照耀着有如戲院的廣告。他的崇拜是東羅馬帝國式的（Byzantine）。顯然地他能很容易

地停止民衆對於他的諂媚。他不這樣做。有一個原因也許是他的狡猾的東方人的特性這種諂媚，這些照片，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武器；他知道俄國人了解一個主人的。或者也許是他歡喜他們。

當他在莫斯科的時候，他是住在克姆林衛城，這大家都知道。克姆林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塊圍地，一個牆圍着的堡壘，內有四五十座房屋，教堂，兵營，花園。斯達林住在三間房間裏。然而他並不是如普通人們所相信的，在克姆林裏面工作。人們傳說斯達林是一個實際上的囚犯，總是住在克姆林的牆壁裏面，這是無稽之談。他每天的大多工作是在克姆林之外做的，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裏，那房屋坐落於莫斯科最熱鬧的一部份，斯塔雅拉·皮羅喜得（Staraya Ploshad）。

他也化費許多光陰於鄉村裏，在他的鄉間別墅。那別墅離開莫斯科約一小時，在厄羅瓦·阿開格爾斯凱雅（Usova-Arkangelskaya），靠近莫斯科瓦河（Moskva River）。那房子係屬於一個以前的百萬富翁，那富翁為一金礦主人兼商人，他唯恐受着迫害，於是

用很厚的圍牆，將他的十英畝的地產包圍起來。斯達林現在還沒有拆去那圍牆。

別墅區域防備甚嚴，從莫斯科到那別墅的一條路上也是嚴密地戒備。斯達林普通到那裏去的時候，是用三部車子，都是倍克得牌（Packards）汽車，走得很快；他總是和汽車夫坐在一起，他坐的是第幾部車，是每天更換的。在邊近郊遊的人和看風景的人，是客氣地叫他們向前面走，不加禁止的。

但是斯達林的戒備，不及希特勒或慕索里尼那樣顯明。他出現於大眾，較他們的次數多。他有好幾次被人看見從歌劇院步回克姆林，與幾個友人一塊兒走，經過擁擠的街道。一年至少有兩次，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兩個偉大的蘇維埃紀念日，斯達林總是立於列寧墳墓上，實際上有幾百萬人走他的面前經過，約相隔十五碼的樣子。

他一點不注意美觀或樣式。他不穿制服，而穿一件黑青色的短衣，扣子一直到頸，一條馬脚褲，和一雙靴子。當他外出的時候，他戴上一頂有帽簷的帽。雖然這不是一套正式的制服，而俄國大多部份都仿效這種服式，黨的高級人員，一般阿諛諂媚的人，他們服裝，都忠實



地照這樣子，穿上這套樣式的衣服，以證明對於黨魁的忠心。

斯達林的常例是工作約五天，再到別墅去休息兩天或三天。他的娛樂不多，但是他歡喜歌劇和歌舞，常到波爾索戲院去；有時他愛好某一個影片，他看契耶佩夫（Chyapaiev）一個內戰的影片，四次之多。他閱讀的書報很多，偶然下棋。他不斷地抽煙，總是有一煙管在他的口裏，莫斯科人談論說他喜吸愛得屋斯煙草（Edgeworthbacco），但不敢公開地抽這非蘇維埃的產品。在聚餐的時候，他的煙管是燃着，放在他的碟子旁邊，在換一道菜的時間中，抽牠幾下。他歡喜喝酒，尤其是白蘭地，他的酒量很好。

他對於性慾的態度是很正常的，合乎健康的。他結婚過兩次。他現在大概是與迦根維諾契的妹子同居，他為他的第一個助手。關於他的第一個妻子的記載，已失於革命時期以前的烟霧中了。她在一九一七年死於肺炎。在那個時候戀愛多少是階級鬭爭的工具；老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是不注重婚姻形式的。由於他的第一妻，斯達林得到一個兒子，現在約有二十五歲了。這兒子不大好。他在工業學校裏的成績很壞——據稱他的大多時間是化費

與一個同班打彈子，此同班即最近逝世的國家政治行政部（G. O. U.）主任孟令斯基（Menzhinsky）之子——斯達林於憤怒之餘，不要他讀書，送他到提弗利司一家工廠裏去做工了。

一九一九年斯達林降低自己身份去到列寧勒格看一個老革命友人阿里祿夫（Sergei Alliluev，這名字即Hallelujah之意）一個鎖匠。他遇到阿里祿夫的女兒，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叫做娜第雅（Nadyezhda），遂娶了她。她生了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名叫威西利（Vassily），現在十四歲，一個女孩，名叫絲維特蘭納（Svetlana），現在九歲。斯達林夫人於一九二九年入工業藝術學校（Promakademia）學習人造絲的製造。關於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宣傳；她如其他的學生一樣地工作，並且來往乘普通街上的車，不用克姆林的汽車。她的志願是想做一個縣托辣斯的領袖。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忽然地而似乎神祕地，娜第雅·斯達林死去。不過幾天以前，人們還在歌劇院看見她，她是健康如常。她死的消息是不加修飾地宣佈出來，葬於紐·威

爾金斯修道院 (The Convent of New Virgins) 的教堂墓地 (奇怪得很，沒有火葬)。  
莫洛托夫 (Molotov)、加里寧 (Kalinin)、渥羅西洛夫 (Voroshilov)、奧第涅基茲 (Ordzhonikidze) 擡她的棺材，紅軍軍隊奏着朱賓 (Chopin) 的葬歌。

於是有種消息馬上傳佈出來了，她先試斯達林所吃的食物，受毒而死。但事實的真相似乎是這樣的；她已經有很厲害的腸痛好幾天了，而忽略了這件事。她不願以她認為的小病來麻煩她的丈夫。也許她有點怕他。她想隱藏着她的痛，保持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守口如瓶。這是盲腸炎，等到她承認她的病時，已是太遲了，結果她死於腹膜炎。

斯達林對於他的年幼兒女的關係是很盡父道的，但他盡力使他的孩子在學校裏受着如其他小學生一樣的待遇。他向沒有到他的孩子讀書的學校裏去過，那學校爲俄國模範三學校之一，牠叫做第二十五學校，設於庇米諾夫斯基街 (Pimenovsky Street)，過了特佛斯喀雅地方 (Tverskaya) 便是。他的男孩在學校裏最近的成績報告單上有七個『平平』 (Fairs)，五個『尚佳』 (Goods)，沒有『甚佳』 (Very Goods) 或『超

等』(Excellents)他的最好的功課是文學。一九三四年春，他被舉爲『先鋒』隊的隊長，先鋒隊爲蘇維埃的男童子軍。

## 六

斯達林的月薪約一千盧布，這在一九三五年在俄國以外約等於三三·五〇金元。他對於金錢完全沒有興趣。如一切蘇維埃的領袖一樣，他是一個窮人；關於金錢不名譽的事，他們中任何人是沒有的。共產黨人的薪金分成若干類，這個制度替代了以前的方法，根據以前的方法，黨員在黨中所得的月薪，不得超過二二五盧布。現在沒有最高限度了；平均薪金爲六百盧布。一個共產黨人，不管他兼多少職，不得支一職以上的薪金；黨員不得保留書籍的版稅。

而在另一方面，斯達林能够如沙皇一樣，吃飯用金的碟子，如果他願意這樣。俄國沒有那一種財富他不可以有，如果他要的話。他過簡樸的生活，但是他的別墅在俄國是等於美

國百萬富翁的鄉村家庭了。他有僕人，汽車，書報。

他對於習俗宗教的態度純粹地是反面的。他的宗教，如其他獨裁者的宗教一樣，是他的工作。他蹂躪正教會，其動機是和希特勒攻擊德國天主教一樣。斯達林曾說：『本黨對於宗教不能抱中立態度，因為……宗教是與科學相反的東西。』但是他讓他的妻舉行一個差不多完全是正教的宗教葬禮，這是值得注意的。他可以說是唯一的徹底讀過聖經的獨裁；這自然是在他的學院時代讀的。

他的朋友很少。渥羅西洛夫與迦根諾維契是兩個最親密的友人。他以友誼態度對待黨中老同僚，但是他們很難親密地叫他，因為約瑟（他的基督教名字）沒有普通的小名。和他很熟的人叫他『約瑟維沙里阿諾維齊』；其餘的人僅叫斯達林同志。他沒有官銜。秘書們或翻譯們都不怕他。假使他們以前沒有看見過他，他們會興奮的，但不畏懼。對於斯達林是用不着做出下流的樣子。他固然歡喜順從的人，但他能受人批評。

俄國人在他的背後，普通叫他『黨魁』。在莫斯科的美國人歡喜叫他『約叔叔』。

(Uncle Joe)這原因是奇特的。

他很少見外客。美國大使伯里特 (William C. Bullitt) 與他同聚過餐，這是很大的榮幸。直到伯里特抵莫斯科時，斯達林沒有接待過任何外國外交官員；甚至英國大使邱爾斯敦爵士 (Lord Chilton) 是在一九三五年春艾登之遊莫斯科才見到他。他不歡喜社交，不歡喜多說話，十八年中只見了七個記者——兩個德國的，兩個日本的，三個美國的——作正式的會晤。

他在特殊的和簡捷的情況之下「接待」伯里特。渥羅西洛夫先預備好一個宴會，斯達林不過是忽然走進來便是了。他是高興的與誠懇的，舉觴祝福桌上的每個人，談話中流露着對於美國有豐富知識，當人民委員們坐在鋼琴旁唱歌，頗似兄弟會中的兄弟神氣的時候，他休息着，抽他的煙管。

近來斯達林已證明他漸漸露面了。他遊新米都 (New Metro) 而事前並不宜佈；他近來作了第一次的播音；他甚至到文化公園 (Culture Park) 吻小孩子——素來不要

聲望的他，現作最後的讓步了。當一九三五年的春季及夏季他接待艾登，賴伐爾（Laval）和貝納斯（Benès）時，關於這接待消息的官報，是由他與莫洛托夫共同簽署哩。

這一部份的解釋是他漸漸地得人心了。他不爲人所愛戴，如列寧爲人所愛戴一樣，但因爲革命一天一天地成功，工人生活標準不斷地增高，即非共產黨人亦漸心悅誠服了。克涅克波克會這樣地指出。莫斯科的新地道引得人民發出許多半不願意的稱贊聲；他們的態度是這樣：『想不到這個傢伙到底也做出一點事來。』

斯達林最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策略，即身任人民權利的保衛者，爲一切人們——甚至非黨人——而努力的戰士。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責罵那『沒良心的官僚政治』，於是說：『最要緊的我們要知道重視人民，重視幹部人員，重視每個能爲公衆謀幸福的工人。現在我們要認識世界所有的一切資本中，最有價值的和最可靠的資本即是人民。』人類到底高於機器呵！

但是這種對人性的讓步來得太遲了，來在可怕的鬭爭，可怕的犧牲之後。假使斯達林

能夠現在放鬆一點，而追求人類的價值，那當然是很好的。但是他的歷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斯達林是接收俄國革命，使得革命進行的人。人類價值暫時地失去了。他是鋼鐵時代的製造者，五年計畫的發明者，一個用使得俄國工業化的方法，俾社會主義在一個單獨國家成功的人。

## 世界三大獨裁終